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6年11月30日第81期（增刊）

本期目录

【纪念周伦佐专辑】

忆旧思亲

彭小华 红尘浊世中安贫乐道的思想者——追思挚友周伦佐

王 锐 我所认识的周伦佐

林 雪 秋风萧瑟送伦佐

书海泛舟

周伦佐 《“文革”造反派真相》目录

周伦佐 《“文革”造反派真相》前言

周伦佐 《“文革”造反派真相》后记

周伦佐 毛泽东与青年学生和下层民众的利益契合（《“文革”造反派真相》选读）

周伦佐 官方话语中左右概念的颠倒（《“文革”造反派真相》选读）

周伦佐 写作的有效性——以《“文革”造反派真相》为例

何 蜀 一部校正“集体失忆”的力作——读周伦佐《“文革”造反派真相》

【忆旧思亲】

红尘浊世中安贫乐道的思想者

——追思挚友周伦佐

彭小华

作者简介：彭小华，女，1967年生于四川夹江，博士，自由思想者、独立写作者、翻译，关系咨询师。主要关注领域为跨文化交流、关系研究、医疗人文与临终关怀，发表数十篇相关文章，出版专著《广告的性别呈现》及译作《最

好的告别》、《晕眩年代》。

体制外思想者、文革研究学者周伦佐兄离世了。作为他的好朋友、他生命最后十年的见证者，一篇追思他的文章，是我给他的最后一件礼物。我因此得以重新体会一遍与他的交往，他的在天之灵想必也会欢喜。

一

那是在2007年6月18日的成都青城山，一个民间的小范围文革研究座谈会。此前，我已听聚会的发起者盛赞《“文革”造反派真相》一书，作者是西昌的民间文革研究者周伦佐，此书被推崇为“文革研究开创性的著作”，这令我对作者充满了好奇。

黄昏时分，伦佐来了。他极其清瘦，背有些佝偻，头发花白，有些长的额发随意铺散，几乎盖住了一只眼睛，脸上的皱纹沟壑般纵横交错，当主人热情洋溢地介绍他的时候，他礼貌而矜持，给人一种绝顶孤独、寒意笼罩的感觉。

我心想，这个人该是经历了怎样的坎坷、磨难、伤害啊，他一定有非凡的经历和故事。

（右图：周伦佐遗像。）

当晚临睡前，我匆匆翻了翻刚刚获赠的《“文革”造反派真相》，仅从体例、结构、目录来看，我就感到这是一部严肃、有分量、有思想深度的著作，心中升起对作者的敬重。

第二天，大家围坐在一起，轮流发言。不记得他具体说了些什么，只记得声音浑厚，围绕主题，陈说清晰有力，遣词用句严谨、考究。那是一种对自己的话题有全面深入理解、对自己的见解充满自信的人会有有的表达方式。我暗自惊讶。想起之前不几天，一位人称文史哲打通的教授朋友断言“思想在民间”，当时将信将疑，这下，我觉得伦佐多少印证了此言不虚。



我最后一个发言。第二轮发言中，伦佐赞扬我理解问题透彻，表述清晰。我

感觉到他的友善、开放，距离感顿时消除了很多。

之后，我们有了更多随意的交谈，感觉他其实挺随和。过两天分手的时候，互相留下了联系电话。他留下来陪女儿游都江堰。

我和其他朋友回到成都后，我废寝忘食读完了他的著作。他对文革起因的分析，对文革发展阶段的清理，对血统派（破四旧红卫兵）与平民（造反派红卫兵）的区分以及各自的作为与责任的辨析，对造反派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的陈说，对造反派与毛的关系，造反派兴起的心理学根源以及造反派与世界上其它国家地区青年人造反的异同对比……都令我耳目一新，与之前了解的主流文革叙事相距甚远。

在那个阳光灿烂的夏日午后，我放下书，拨通了伦佐的电话，致以一个读者的敬意。正所谓无巧不成书，他已携女儿回到成都市内，就住在与我办公室一街之隔的对面酒店！我们马上约见了，当我们热情握手、再次坐下来交谈的时候，他完全放松、自在，聊得投机、快意。

二

那时，伦佐还生活在西昌。次日，他带着女儿回去了，从此，我们开始了频繁的邮件往来，讨论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交换各自的文章，回馈阅读感受，分享阅读到的好书籍、好文章，也相互推荐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2010年，伦佐离开生活了五十多年的西昌，只身来到成都生活。他的居所距离我家步行就二十分钟，见面十分方便，我们也充分地利用了这个机缘。

我慢慢了解到，伦佐50年代初生长于大凉山地区的西昌，由于“黑五类”的出生与贫寒的家境，仅读到小学四年级就辍学谋生，依靠自学和独立思考，建立了自己的思考体系与分析方式。早在70年代初，他就完成了对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解构，开始写诗，进行哲学、心理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探索；80年代中期，携独立思想的锐气，从边缘闯进中心，以小学肄业身份启蒙“天之骄子”——在成都、重庆、武汉等几个城市的主要大学进行流浪讲学，在众多青年学子心中撒下了思想解放的火种。同时，他以民间、体制外思想者的身份，以超越的姿态，对国际国内政治局势、思想思潮状况保持着敏锐的观察，在贫病交加的境况下，奋力写作，积极参与思想讨论，提供独到的见解与认知。

有了更多的了解后，我发现伦佐是一个外冷内热、渴望交往、善于交谈、题域广泛、话题丰富、多情易感的人；原来，他不仅是一个思想者、学者，也是一个诗人、文艺评论者，兴之所至，会赋诗、诵诗，或者唱几句美声。他的诗性、文学性与他的哲思相得益彰，他的谈吐因此有情感、有温度；在他衰弱的病体内

是年轻、飞扬的情绪，活跃、敏锐的思想。

由于患支气管炎、慢阻肺，每一次离开家门，对伦佐的身体都是巨大的考验，走几步路就喘得不行，出一次门，身体往往要几天才能复原。因此，除非是外地来了朋友或者很多朋友聚会的场合，他一般都不接受朋友的邀请外出。交流是人的基本需求，何况伦佐是那么热爱思想交流的人。我在成都的时候，尽量每周都去看他一次，天南地北大事小情逸闻趣事畅叙一番；有时候，也同其他朋友相约去他那里聚会，那就更是思想的盛宴了。

伦佐生活清贫，但每次去他那里聚会，如果是去他楼下的“苍蝇馆子”，他一定坚持由他办招待。后来，他身体更差了，移步去楼下的“苍蝇馆子”吃饭都困难了，有客到，他会提前安排钟点工罗姐做好几样拿手菜。虽然环境简陋，连一张餐桌也没有，餐具也不齐整，但是，宾主之间交谈兴致盎然，感觉上满室生辉。

伦佐是一个真诚的交谈者、批评者。他对朋友的友情表现，就是认真观察对方、阅读对方的作品，根据他自己的判断标准，给出分析。他认真、坦诚、尖锐，有的朋友难免被他的看法刺痛。我理解，他希望贡献自己真诚的意见——他对自己的意见是珍视的，他的思想是他唯一的财富，向朋友直陈己见，就是他最大的友善。

日常交流中，伦佐掌握评价尺度之严格一如为文。在他那里不存在言不由衷、虚与委蛇。他认为那是对自己的背叛，对朋友的欺骗。

作为好朋友，伦佐对我自然有很多的认同和欣赏，同时，他也是对我最不留情的批评者。有一天，几位朋友在他住处谈到商业社会、消费文化对人心的异化与毒化，他突然很严肃地说：“小华，其实你有时候也相当俗气。”——因为他觉得我对主流话语审视不充分，对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有相当程度的接纳和融入。伦佐的话一出，朋友们都愣住了，我脸红筋胀，却也没有做任何辩解。我觉得那是他对我的棒喝，至今仍然以此自我审视。

伦佐介绍给我一些体制外写作界、思想界的著述和朋友，我得以看到一群与过去我熟悉的人们很不一样的人。他们的谈论、关心，与主流学术界中的人们有很大的区别。他们坚决地抵制主流话语的侵扰，保持思想与话语的独立，疏离、拒绝、傲视主流价值观。为了独立、自由的表达，他们艰苦卓绝，不仅不能凭借作品赢得职称、头衔、金钱，甚至要冒坐牢的危险。伦佐本人就曾作为思想犯两次系狱。

认识伦佐的时候，我对学术界的信心已经动摇，开始放弃学者理想，但还在继续写着学术文章。伦佐认真阅读我的每一篇文章，包括我的博士论文。他赞扬我的努力，但指出那种文体不适合我、是对我的局限，形容好比是给一个活泼泼

的人穿上重重的盔甲；在读了我的书信、笔记、情感写作以后，他觉得是适合我的文体。他鼓励我进行及物写作、介入写作，常常就语言、文字、标题给出建议，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写作感悟和经验。

对于他这个朋友之于我的独特价值，伦佐自己很清楚：多年来，他用心、开放地观察我，并随时把他的观察结果奉送给我。如同其他朋友一样，他的赞扬，对我是鼓励，是强化；他的批评，对我是鞭策，是照亮，都促进了我的自我认知和认识的扩展、深化。这是我至为珍惜、感激伦佐这个朋友的地方。

三

如果说伦佐可以铁面剖析朋友的写作及他人的性格特质，那么，他也以同样的尺度解剖自己的写作和自己的性格特质。比方说，他把写作者分为有才气和没有才气两类，有才气的是那种文采飞扬、善用妙用比喻和意象的写作者。他称自己的文字仅仅足够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自谦缺少才情、才气。

伦佐自己曾经是造反派，小小年纪成为了西昌八二六派红卫兵的理论家，是伶牙利齿、能言善辩的铁嘴，有“喉舌”之称，后来又写了为造反派洗冤的《“文革”造反派真相》。但是，他对造反派总体的人格特质评价不高，认为很多人保留着文革时期的派性与造反派脾气，泛政治化、难容异见、注重权术……作为一个群体，他叹息这辈人对于民主事业已经发挥不了多少积极作用。在谈到当下一些原造反派人物力图“开历史倒车”的表现时，他曾慨叹自己写《“文革”造反派真相》时一心为造反派洗冤，而对造反派评价过高，成为此书的一大遗憾。

他自谓超越了派性，生活中也很少与过去的造反派朋友交往，但是，他也意识到自己多半还是属于古典型、权威型人格，在人际交往中没有完全现代化，有时候也显得独断、专横。他有自我觉察，不吝自我批评，也在自我调整，尤其与我的交往，他形容是他“实践自由主义”，不总是习惯，但觉得这种交往方式使关系简单、轻松。

他大致接受了我“平行呈现”、不以说服对方为目标、不要求也不追求思想认识统一的交流原则。在这样的交流中，我们可以平等地讨论任何问题、坦率地呈现各自的立场、见解而鲜少争论，更不至于争吵。不同意的时候，互相尊重，各自保留。从对自由主义的评价、对一些共同思想朋友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认识，到世界发展重心是否转移、西方是否衰落中国是否成为世界历史领跑者，以致人际交往方式、亲子关系等等，我们从来没有达成过完全的共识，但持续地进行谈论，认识因此丰富。

无论如何，伦佐是个严肃认真、有理有据的思想者，跟他讨论问题是高强度、

有趣的思想操练，哪怕对于我不认同或者不完全认同的一些观点，我也从他独到的视角和方法中受益。

作为非常了解伦佐的他的兄弟、思想同道，体制外诗人周伦佑先生认为，“如果说当代中国真有一个不依赖转述西方和注释古代而获得自己的理论话语并自成体系的本土哲学家，那一定非伦佐莫属！……他的哲学思想（包括艺术本体理论）直接来源于他个人的生命体验和独立思考。”

我对伦佐有同样的认识，这也是伦佐的自况。一位对伦佐有透彻了解的女性诗人、作家朋友也说，伦佐是一个自知的人。

他在 2008 年 3 月给我的邮件中写到：“我还为《爱的哲学》补写了一段文字。内容是我在和你谈话时被触发的。我的思想——从产生到完善，都是这样得来的。与书本无关、与知识无关，主要来自体验。所谓‘得到’，主要是偶然被触发，并找到恰当的文字来表述。”

四

伦佐不仅没有受过系统的学历教育，而且，他也不以读书数量自豪。他凭着特出的记忆力和概括、提炼、吸纳的能力，对于古今中外的哲学、宗教、心理学及历史、文学、美术、音乐，他不仅有整体性、系统性的把握，而且言谈中对具体个人、作品、概念、隽语信手拈来，随口引用。他在阅读别人的时候，带着自己的体验，并以此验证；古圣先贤，他待如时人，在精神世界里与他们进行推心置腹的交谈或者激烈的论争；也许当代的一些思想者、写作者不一定知道伦佐，但是，伦佐对他们很多人，都很了解，定位、认识很清晰。

伦佐自述对于公平、正义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他崇尚自由、民主，希望中国社会早日全面挣脱中古式社会的束缚，实现全面现代化。他自认为是民主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在人道主义、自由、民主、宪政等价值上契合，视自由主义者为朋友、同道，但是，对于自由主义者主张的多元主义、相对主义、和解、宽容，他有保留、有质疑。对他来说，自由主义太过温良恭俭让。

对于公共话语空间一些有关文革的言论的忧虑，他在给我的邮件中写道：“其实已经超出学理研究范围，而涉及到社会现象。目前许多人对毛泽东及其文革的肯定，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反对官僚阶层，二是重视工农大众，三是鼓励人民造反。主要来自两部分人：一是思想僵化的原造反派头头，二是不满现状的现贫穷人群。你如果在网上搜看那些文革文章的跟帖，会看到肯定的声音更多。对于如此现象，自由主义十多年来关于文革问题的片面言论负有很大责任。就是说，他们未能认真区分那个运动哪些东西应该否定，哪些东西应该肯定。当然，更主

要的原因还是腐败现实引起的怀旧反应。社会生活中，人们对于现实的不满，往往需要寻找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反的观念支撑。从官方到知识精英对文革的一片否定之声，难免会带来人们的想象依附，并以此作为现实状况的对比景象。严格意义上，这种思潮并不具有学理价值，但是对于推动当前社会变革却不无意义。仔细分析会发现，他们在两个方面与民主运动并不矛盾：一是支持为 89 年的那场运动平反，二是反对国内现状。民主或者民主运动，从来都需要社会各阶层的合力，这两个方面正是其合力点。自由主义所设想的那种靠上层‘精英’进行制度改革来完成的民主，在中国当前语境下很难成立。”

那么，文革会再次发生吗？

他的回答很干脆：“第一，文革是由过去的统治者发动的，现在的统治者或者民主力量不会再发动什么类似文革的运动。所以根本不存在发生二次文革的危险；第二，反对现在政权可以有各种理由，有向前看的，有向后看的……只要现实目标一致就可以加入合力。北京知识界在悼念华国锋之时，甚至不惜否认华的‘两个凡是’问题来诋毁邓小平，就是一种合力方法。”

五

对于自己的境况，伦佐曾在给我的邮件里如此概括：“功名——没有，金钱——没有，家庭——没有，爱情——没有，亲情——没有，住房——没有，甚至健康——也没有。”

但是，“我会坚持，直到倒下的那一刻”。

他做到了。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他都坚持着自己独立、审视、超越的态度和立场，坚持思考、求索个人人生与国家、民族、人类的命运乃至宇宙的奥秘：道。

他不以自己现实生活的窘境为意；他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堪称自由、自我、个性、独立的贴切注脚。

在金钱占有、物质消费的意义上，他是贫穷的；在思想丰盛、精神享受的意义上，他是富足的。

伦佐五十岁左右病退后，以思考、写作为职事，著述颇丰。只是，由于他坚持体制外的言说立场，其思想成果难以为国内主流刊物、出版社接纳，当然也无法进入广泛的阅读与思想空间。包括在文革研究界影响巨大的《“文革”造反派真相》，也只能在香港出版，仅为文革研究者和对文革研究特别上心的少数读者所知，正如文革研究同仁徐友渔感叹的，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传播水平。伦佐在体制外刊物上发表的《爱的哲学》、《当代文化运动与第三文化》、《新人本主义思潮论》、《群体创伤与第三代人的觉醒》、《第四思潮：分流与合龙》、《马克思主义

登陆中国的奥秘》、《民主十五家》等富有洞见的著述，传播范围更是有限；更多的如《人格心理学》、《对话：中国往何处去》、《叛逆圈》、《拯救人性》以及尚未完稿的自传《火莲花》等多部哲学、心理学著作，尚且未见天日，也不为很多朋友知晓。

文章、著述是一个思想者与世界沟通的媒介，以此寻找朋友、召唤同道。无论多么艰难，真正的思想者都在竭力表达，互相寻找、识别。伦佐凭着已经发表的思考得到很多海内外体制外思想者的理解、认同，包括精神、情感上的支持，这对他是莫大的慰藉。

在前面所引的一封邮件中，他在自己概括“什么都没有”后面接着说：“我现在只剩下四样东西了：残存的生命，满腹的思想，小女笛儿，以及少数像你这样能够理解的朋友。”

据我所知，这少数理解他的朋友数量也挺可观，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彼此的友谊建立在纯粹的认同和欣赏基础上，无涉世俗的利益与利害得失。无论对于伦佐，还是朋友们，这样的友谊都是红尘浊世里真正的稀缺与奢享。

2016年5月22日，在我离开成都到美国之前两天，伦佐头痛、呼吸困难、难以入睡、痛苦万状，我和他女儿笛子一起把他送到医院，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他也保持着尊严和思考。我走之前一天，他专门约我去医院，跟我讨论起实施安乐死的可能性。我告诉他中国法律不允许安乐死、没有实施安乐死的条件，鼓励他扬起精神的彩旗，往生处想，配合医生的治疗，好起来以后继续写作。他温顺地答应，说争取活到我11月初回成都，再好好跟我聊聊生死话题。

眼看只有十天就可以再见了，他却在入院治疗5个月之后，先是传来病危的消息，第二天，友人李亚东去医院看望他后，兴奋地告诉我他又活过来了，有可能等到我回去，并说当晚会为他祷告。

次日早晨，获知他安详地去了。

除了理性与逻辑、感性与诗意的思考、分析和表达，伦佐思想中还有鲜为人知的宿命论、神秘主义的一面，因为觉得一般人难以理解或者会意，他在写作和交谈中有意识地回避了；在他的思想观念中，宇宙是有一个唯一、最高的主宰者上帝的，每个人的命运、运程，也都是注定的。我觉得这一面当然丰富了伦佐的感知、感受，也因此，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委请了几位基督徒朋友去病床前给他传福音，希望能安慰他的孤独、焦虑、恐惧，获得心灵的安宁和灵魂的皈依。伦佐与这些朋友都有愉快的交谈。

学界的朋友、同道都为失去伦佐哀悼、惋惜。

文革研究学者徐友渔感到悲痛，并托我替他表达哀思，赠送花篮。

历史学者朱学勤说伦佐的去世“是文革研究界不可弥补的损失，也是我个人

的心头之痛，只能节哀顺变，接受这一难以接受的事实。这是一种钝痛，不尖锐，但长远，却难以为外人道”，他托成都朋友代献花圈，并写上“拔地苍松有远声——痛悼伦佐远行”。

文革研究学者何蜀在闻讯后长叹：“一代精英，壮志未酬……”在他主持的文革研究网刊《昨天》发布讣闻，并提出愿帮忙整理伦佐未完成或完成后未及发表的有关文革的文章或回忆文字，“争取让其发表出来，让他最后的思想闪光得以公之于世。”并拟在《昨天》编一纪念专辑。

知道自己也欣赏和尊重的同道朋友的反应和评价，伦佐该是多么愉快！

你终究是不孤独的，对吗？

美国诗人哲学家爱默生把得到诚实的批评家的欣赏视为一种成功。

那么，你终究是成功的！

安息，佐兄！

【忆旧思亲】

我所认识的周伦佐

王 锐

—

10月23日是个星期天，中午我与家人外出吃饭。归家开电脑，才见何蜀兄于中午时分发来的邮件：“刚接成都友人邮件，周伦佐走了。”这消息，让我深感震惊。当即回复：“惊悉伦佐兄已走，深为叹息。”又说：“原拟9月上省城，顺带拜访探望周兄，可惜因故未成行。没想周兄这样就走了。以我之见，周兄脑里身上，是有很多内容的人。如此离世实在是可惜了。深为叹息的道理正在此。”

6点左右，微信里有了正式消息。省城文友阿强转发署名“秦臻”的消息发布：“中国文革研究学者周伦佐因病去世”。文中对伦佐兄的定位，在“文革研究学者”之前，又加上了“中国大陆体制外思想者”这样一种称谓。简单介绍生平及主要著述之后，评介说：“周伦佐先生的逝世，是中国体制外思想界的一个真正的损失。”

我在朋友圈转发了这条消息，并写了：“深切悼念伦佐兄。一路走好。”

其后不久，周兄家人（后知是其女儿周梦笛），用伦佐兄微信号发布消息：“家父周伦佐自今年五月病情加重，进入第一人民医院治疗至今，经过近半年与病魔艰苦抗争，于今日八时四十分离世。据医生说，他走时神态安详，并未承受

太多痛苦。目前遗体已送往东郊殡仪馆，暂定火化时间是后天即周二上午。”

周二那天，果然见到微信号消息：伦佐兄遗体已火化，骨灰暂存殡仪馆。家人特向关心悼念周伦佐先生的友人致谢。

古时土葬，有入土为安之说。现今，火化了即为“安”。自己这种年岁，近些年不时有“某某走了”的消息传来。其中有故友同学，也有很熟悉多有交道的作家朋友。却没有哪一次像伦佐兄的离世，让我深感痛惜遗憾。实在说，那些天我一直心里难“安”。

“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这句老话，据说毛晚年也常对身边人叨念。孔子活了七十三，孟子活了八十四。两位都被尊为圣人，也为“人生七十古来稀”的中国人，树了两个长寿标杆。当今，有资料称，中国男人的平均寿命，已达 73 岁多一点。用这两个指标考量，“享年六十四岁”（按身份证年龄算）或“享年六十六岁”的伦佐兄，都不算及格。此为遗憾一。

对伦佐兄的评价，正如那天我发给何蜀兄邮件所言，“脑里身上，是有很多内容的人”。而今这些内容，大部分没化为著述成果存世，人却说没就没了。此为遗憾二，也是最大遗憾。

古人说的生老病死，是人一生须经历的四个环节，或四道坎。其中，生死似乎天定，人自身掌控的空间不大。而老病方面，人自身把握的机会要多些。我的看法，伦佐兄恰恰在老病这两个环节上，应对得不是那么好。再以我这些年对伦佐兄的就近接触了解，其一生，大致可用“才识卓越，生不逢时，命运多舛，晚境凄凉”这十六个字予以概括。其中，“生不逢时，命运多舛”的事，很多人可能遇到。但“晚境凄凉”这番情形，在我所接触的亲友、熟人圈中却是比较少见了。

叹伦佐兄“晚境凄凉”，是我去年底在其住所拜访时亲历亲见。以及其后不久从网上得知伦佐兄为治病、为生存，不得已公开募捐的消息后，内心所生出的悲凉和沉痛而来。

二

知晓周伦佐其人其名，在我应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事。其时，有一个一起闯荡做事、年龄比我小得多属于晚辈的诗人朋友，进入了有名的“非非诗人”圈子。而周伦佐双胞胎弟弟周伦佑，正是“非非派”的精神领袖和“教父”级人物。从朋友口中，就知道了周伦佑，也知晓了周伦佐。那时，我已到了省城，并在东门街 95 号安扎下来。从朋友后来写的文章所知，周伦佑那时来过东门街 95 号我那地儿，但之间并未有过见面交往。

又过了好些年，不知是从诗人朋友，还是我自己在送仙桥书摊上，到手一本“非非诗人”出的刊物。其中有周伦佐一篇访谈。文中给我印象深刻的，有那么一句话，大意是：我担心能否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把我那些思想（或思考的东西）全部给写出来。

真是一语成谶。

不过当时未识伦佐兄，也未见其文字，读到这话，还颇不以为然。心想这个周伦佐，未免太狂了，也太自恋。这一看法我还对诗人朋友讲过，他当时怎么回应的，已记不太清楚。好像是说，周家这两兄弟，都有点狂。

2006年前后，我已决定收摊离省城，回自贡老家静心写读。那位诗人朋友，几年前已去《晚报》文艺部做编辑。有天，两人在西安南路喝酒。闲谈中，他告我一消息，说是周伦佐写了一部关于造反派的书，已在美国出版，评价还不错。朋友的意思似乎在说，文革研究也大有弄头。他知晓我收藏有大量文革小报传单，也正在做点文革研究什么的。

能写一部关于造反派的专著，而且在美国出版（朋友当时说的是在美出版），这让我对周伦佐，有了一点兴趣和认同。但真正让我对伦佐兄另眼相看，是读到他写某收藏家的那篇《一个民间博物馆的政治底牌》（标题又作《一个人的异端神话》），以及另外两篇访谈录之后。那是2011年春天的事了。

有天，北京一位作家朋友发来几篇圈内私下流传的文稿，其中就有那篇《政治底牌》。读罢此文，我不禁对伦佐兄大生好感敬意。首先，谈别人的“政治底牌”，等于也亮了自家政治底牌，而且是逆“主流”而动，这需要一点勇气。特别欣赏伦佐兄文章末尾那几句话：“我知道一个人的政治理念并不等于他的全部精神世界，后者更广大更丰富。对于某某某的评价，也可以超越政治立场来看他的精神追求——比如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然而在当前中国异常严峻的政治背景下，是否具有自由民主诉求，已经牵涉到一个人的人性良知和人格底线。”此其一。其二，伦佐兄在文章中，其学养见识，文笔文风，观察切入视角，逻辑水准，都显示出相当功力，让人不得不佩服。

据说伦佐兄此文，一度在海内外文化圈内产生影响（北京那位作家朋友能将此文推荐转发于我，就是证明之一。一般来说，荐给我的，都是其认为可读的好文或“禁文”）。后来，我将此文转给何蜀兄。何兄当即回复，说这文章他早看过了，是周伦佐直接发给他的，而且周兄以后忘了曾发过，又发了一次。由此可见伦佐兄对自己这篇文章是有点在意的。

三

当时，既对周伦佐有了认同，就在网上搜了一下，又找到其两篇访谈录。认真读过，才切实感到，这个周伦佐，“狂”得有点道理。其理论素养之厚实，对哲学、文艺乃至政治等钻研思考之深入，非一般文化人所能及。想来正是这种深与厚，他才“狂”得起来。

如此，心里面就有了与君一识，当面茶叙的愿望。毕竟，偌大一个川省，就文革研究等，能作点深入交流的人，竟是屈指可数，平时多有寂寞感。

不过，对伦佐兄这样的人，要与君一识，也得寻个合适机会。笔者所知，省城文化圈，关系复杂微妙，是非颇多。若是引荐人没找对，可能适得其反。所以一直迟疑着，也等待着。

2014年，合适机会终于来了。4月底，省城文友阿强，先后来邮件和电话，说想看看我那部《文革小报研究》书稿，请我发给他。我稍作考虑（毕竟是未刊文稿），将全书电子文本发给了阿强（事后知晓，是有人借此考察我对文革的认识和研究水准，以及笔力等）。大约一周以后，阿强来电话，说省城有位朋友想周六来自贡拜访，问可不可以安排一天半天时间，茶叙一次。恰好那天，前面提到过的省城诗人朋友返自贡，早有相约，遂回复阿强另约时间。好像是又过了一周，周六或周日，阿强偕省城那朋友一起来了。

甫一相见，阿强对我介绍来客时，只提尊姓，不说大名身份。但我当即知晓对方是谁。此访客，正是伦佐兄《政治底牌》中提到的C先生。这可是曾经大名鼎鼎人物，成都某派红卫兵领袖，一度入省革委会任副主任。经历过四川文革的人，应是知道他的。文革后，因赵紫阳力保未被当作“帮派头头”清算下狱（据称赵曾发话，省内两大造反派红卫兵头头，各树一典型不追责且保留官方职务。另一头头为川大八二六头头江海云，直到前些年去世时仍是副厅级干部）。也听说C先生后来被作为“三种人”开除了中共党籍，辞官下海经商，几经打拼浮沉，现今已成大老板，资产过亿。伦佐兄那篇文章中，有如此叙写：因为C是一个集团公司的老总，那位民间博物馆负责人对其非常尊敬，尊称为“商界大哥”。另外我还听说，周伦佐眼下，正在C先生那里做事。

那天茶谈在自贡老城区釜溪河边，十字口大桥一侧人气很旺的露天茶园。初夏的阳光很好，时有带河水气息的清风徐来，令人惬意。此处闹中取静，进退皆宜。平时我与文友茶叙相见，多在这里。访客虽贵为大老板，但仍谈锋很健，且率直实在，有北方汉子本色。话题也广泛，文革之外，包括某些人与事的直言评说。平心而论，这位C先生，比起我见过的多数文革领袖或类似经历者，见解与观念方面，确是要好得多。起码没有那种抹之不去、乃至深入骨髓的“崇毛情结”和“文革情结”。以我感受，似乎很接近我等有自由思想诉求的体制外人士。茶谈间，C还专门问我，在读过的那许多文革回忆录、个人传记中，哪一个人哪

一册书写得最好……

对方是有备而来，不轻易言走。我也不嫌耗时相陪，茶谈足足一天，下午 5 时许才分手。一天交谈，我大致明白此行意图：对方想让我出来为其写文革回忆录或个人传记。这才有此前阿强兄突然想看看《文革小报研究》书稿，也才有已成大老板的 C 先生忙中肯驱车数百公里专来自贡一晤。其一是想当面考察我的见识学养之类能否胜任，二是试探我是否可能出来全力投入此事。

当然，对方的用意没直接明说。我知其意，遂委婉作答：目前主要想进行长篇小说写作，暂不考虑其他安排。不过，谈及今后，对四川文革研究课题，不排除某种参与。

我婉拒接手回忆录或个人传记，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年事已高，眼下一点有限人生，想主要写写小说，连文革研究写作都推到第二位，当然更不会考虑为他人著回忆录或个人传记的事（哪怕重金相聘）；二是，曾听江湖传言，C 先生这传记，已先后转请多人，都未能进行下去，此前相中的执笔撰写者，正是一度在替他做文字编审工作的周伦佐。不知什么原因，此事又未成。古话说，君子不夺人之爱，或称，君子不掠人之美。有伦佐兄那事在先，而且其间不知有些什么周折波澜，我贸然介入，从江湖道义上讲，此事不可为。

记得那天茶谈快到分手，我才不经意问了一句：“也不知现在周伦佐在干啥？”C 当即作答：“周伦佐在我那里。”其实我是有意发问，是为今后一识伦佐兄作某种铺垫。因为 C 一再说这天谈得愉快，并再三约我日后有空赴省，一定去他那儿造访做客。我也答应了。

四

接下来的 6、7、8 月暑天酷热，不宜出行，也不便访友。一晃到了 10 月。刚好有位收藏界陕西朋友，赴昆明一个什么会，返时在成都停留，约我一见。如此，10 月中旬，我就去了省城。行前，我将大致行期告阿强。阿强很快回复称，C 先生很欢迎我去做客，并问需不需要安排住宿。我回答不必。到省城第二天，送走陕西朋友，即与阿强同访 C。

没要对方车迎，我与阿强乘公交去的。途中，阿强谈及，作为 C 主要资产那座大厦，租出去，每年收租金就好几百万。还称，那天来访我坐的“劳斯莱斯”豪车，价值 800 多万。又建议说，最好从 C 那里拿点什么项目来做。阿强大概看出，因文革研究，C 对我有某种好感或赏识。对此我未置可否。阿强比我年轻很多，在一家经济日报做事。系招聘而非在编人士，有此想法也很正常。在我，则纯属礼节性回访，主要还想借此一识伦佐兄，肯定不会言及什么做项目的事。

那座大厦，在省城黄金地段。阿强联系后，C派年轻司机下来接，经一部专用小电梯上楼。C自家使用了两层，一层公司办公兼会客，一层C独用，个人办公室、书房兼居室。此两层与其他楼层无通道电梯，全封闭。

这天，C态度亦热情友好，茶谈之余，还兴致勃勃沿楼梯下到他个人独用那层，领我俩一览了他的办公室和书房。主客品茶闲聊，在类似露天茶座有园林风味的宽大阳台上。晚饭时间，C亦殷勤留餐。

然而，始终未见周伦佐身影，我不免纳闷。直到晚间快要吃饭了，终于忍不住发问：“怎么没见周伦佐呢？”C稍愣，问我：“想见见周伦佐？”我点头：“想见见他。”C一笑，大度地说：“我这就打个电话，让他过来。”

果然手机打过去：“老周哇，身体怎么样？能不能过来一下？这里有两个朋友想见见你。过来一起吃饭吧，我这就派车来接你好吧？”电话那头好像答应了，C立马派司机去接。

大约半个钟头后，周伦佐在司机陪同下，终于现身。初见的印象是：伦佐兄个子不高，瘦弱单薄，面有病容。但精神尚好，有文化人温文尔雅味儿。时未入冬，已身穿及膝冬衣（短大衣模样），头戴一顶黑色棒球帽，可见体质确差。

晚餐早已备好，C稍予介绍，即入席就餐。主客就4人：C，我及阿强算客人，陪客伦佐兄。一张小餐桌，各据一方。年轻司机及其他手下人未入座。菜品也就几道家常菜，有酒。一般品牌高度白酒，我和阿强能喝一点，C好像也陪着喝了点。伦佐兄滴酒不沾。

毕竟初次相见，伦佐兄话不是太多。当C介绍我时，他“哦”了一声，露出知晓其人的神情，说：“就是写了红学家那位。”看来，他读过我那篇《自贡数百造反派狱中绝食事件始末》。那是刊在何蜀主编的《昨天》上的文章，其中提到，当年绝食事件的一位造反派人士，后来成了知名红学家。后来在车上交流，伦佐兄还带点赞赏道：“不错，你那篇是为造反派说话的。现在的文章，多是贬造反派，骂造反派的。”看得出来，伦佐兄对文革研究者及有关著述，是否对造反派持公正客观立场，相当在意。这可能和他经历有关，也与他文革造反派问题的持续研究关注有关。

应当说，那天的晚宴气氛，若不是发生了后面的吵架，还是很不错的。

吵架一事，发生在餐叙的中途。吵架的双方，竟然是主人C，和请来做陪客的伦佐兄。这番餐桌上的吵架，可以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包括主人C。

当时究竟是怎么吵起来的，还真没弄太明白，总之，两人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了。越吵越厉害，越吵声音越大，情绪越激动，以致于C还拍了桌子。伦佐兄也面色铁青，脸上很难看，可态度上却不愿退让。

事后我努力回忆，好像有这样一个细节，餐叙间，C向我和阿强谈及伦佐兄，

说了这么两句话：这个周伦佐，本事（或学识）不错，就是性情（或脾气）有时有点固执。总之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可能伦佐兄认为，C当着客人的面这么评价，有伤他的面子，心中不快。于是说起一件具体事情，说C编的一套书，原说的是署周伦佐主编，后来却改了，伦佐兄只任审稿或什么名义。C坚持说这样更好，因为只有其中某一册书，才真是周伦佐编的，其他不过审审稿，有的甚至审稿也谈不上。两人就这样说开，并争执起来。

伦佐兄当着我们的面说，一套书之主编，应是权威、内行，意思C不该当这个主编。C说他过去就做过主编，并举出某丛书为例，就是他任主编。两人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从议论转化为争执，又从争执发展为争吵，且逐渐升级，开始有了火气。其后，又互相牵出一些陈年旧事，彼此指责不休。比如，C指责伦佐兄，说是某年某次，C在一公众场合讲话。刚下来，伦佐兄当着众人的面，说某些地方C不该那么讲，错了。弄得C面子上不好过。如此等等。

餐桌上就我们4人，我和阿强是客人，与他俩初识不久而非深交，无从相劝。况且，他俩争执的都是具体的过往琐事，外间人不知详情，难断是非。C手下人也不敢出面，任凭两人吵下去。其时，我与阿强就那么呆坐着，面面相觑，看着他俩在餐桌上吵，很尴尬，也很无奈。

伦佐兄一直不肯退让的态度，看来让C真正动怒了。气恼之下，他甚至用手大拍其桌子。幸好C当时还保持了几分理智，盛怒之下也没说什么难听话和过头话。两人争吵大概持续了二十多分钟样子。最终还是C先冷静下来，感觉当着客人的面，再吵下去也不像话，况且自家身份不同，就首先停止了发声。

看C不再多言，伦佐兄也停止了争执。小餐桌上安静下来。C恢复常态后，又才重新招呼基本上已停了筷子的我俩，继续喝酒吃菜。对伦佐兄似也待之如故。主客4人，终于将这顿被争吵搅乱的酒饭吃毕。

道别时，已是晚上十点多。C亦热情邀我和阿强，有机会再来他这里做客，并派车嘱司机将我等三人分别送回旅店及住所。

实在说，通过这次拜访，及餐时发生的那场意外争吵，让我得以一窥伦佐兄，在C那里的真实处境。当时心里那感受，就四个字：“寄人篱下”。

后来与何蜀兄聊起此事，不料何兄说他与周伦佐初次见面时竟也遇到了相似一幕。那是他与伦佐兄在邮件、电话交往多年后第一次在成都见面，也是由C宴请，同时还请了蓉城几位关心文革研究的朋友，包括伦佐之弟伦佑。何兄因对蓉城路况不熟，视力又差，是由儿子陪着去的。宴席之前还在漫谈时，不知为一点什么小事，伦佐兄与C一言不和，竟爆发了争吵，而且越吵越凶，双方都拍起了桌子。好在那天人多，两边劝，总算劝止了……得知我的又一类似经历，何兄有些疑惑：会不会是伦佐兄不愿让人误认为他依附于C，有意要在外人面前表

现一下敢于对 C 顶撞？其实伦佐兄在私下交谈时，除了对 C 对他提出的某些文字编审意见不予接受而略有微词外，都是替 C 说好话，对 C 的行事为人表现出理解。

那天上门访 C，还有一件事引我相当不快。这就是，下午我和阿强被司机接上楼，在宽大阳台的茶座上刚刚坐定，还未及茶谈，C 就示意让我们把手机交出来，让人另行保管。C 也解释了这样做的理由，好像是防止谈话被窃听什么的，并说是他这里的规矩，凡来此的客人都如此。我虽心里不快，但又想，既是规矩，客随主便，我和阿强乖乖交出了手机。后来伦佐兄至，也被嘱交出手机。

辞别时三人手机被发还，却出了意外：手机都被雨淋湿，而且通通进水死机了。原来，将我们的手机收走后，不知是那年轻司机还是其他人，并未予以妥善保管，而是拿到另一侧的阳台，随便置之露天茶桌上。恰好傍晚开始下雨，我等三部手机，就此被雨水湿透。

伦佐兄和阿强就住在成都，似乎问题还不大。我是只身赴省，手机死机意味着与家人失联。回旅店，我即将手机水迹擦干，把电池卸下，期待过天能恢复。但第二天仍无法开机。去街店修理，“开机费”就索要 80 元。我那老式手机价值也不过三几百。一气之下扭头就走。那一整天心情大坏，生怕家人与我联系不上，以为我“莫名失踪”生出什么事情来。四处寻不到电话。旅店电话，只能打进不能打出。一直折腾到下午，才好说歹说，借用旅店小妹的手机，与省城另一朋友联系上。此友原是我学生，跟随我多年，如今成了朋友，亦在省城立足。这些年我每赴省，总要茶叙小酌。得知消息，他当即赶来我住的地方看望。又用他手机，才与家人联系上，并告知了归期，这才安下心来。

餐桌上的吵架，以及收缴客人手机两件事，让 C 初次留给我比较不错的印象打了好些折扣。周伦佐于 C，就说“高参”、“智囊”算不上，门客该算一个吧？谁听说过春秋时代的孟尝君、平原君等会在餐桌上当着来客与门客吵架？

至于收缴客人手机防窃听，更是不可思议。电子产品发展到今天，有关部门和人士，要窃听点什么谈话，办法多的是。此举防的可能不是窃听，而是被来访客人录音吧。

有点想不明白的是，伦佐兄哪怕不算手下员工，也算是常客。可他一样被收了手机。更让我有些纳闷的是，以伦佐兄之个性，哪怕一句话不合也敢争执吵架的他，竟然也忍受这种“礼遇”，乖乖交出了手机。

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对 C 多年来顶着阻力和风险，致力于编辑《赵紫阳在四川》、《赵紫阳文集》等，表示赞赏和相当敬意。为此，我也尽可能为之提供了自己收藏的相关资料。

五

那天在送我们的车上，伦佐兄就告了他手机号。并带点得意说，此手机号，许多人想换去，他都没换。不用说，那几位尾数，是当朝每年都要紧张一阵的“敏感数字”。就此一点，我也感觉伦佐兄这人，确实有点意思。

归家大概半个月后，我给伦佐兄打了第一个电话。完全没提餐桌上争执以及他与C关系的事，问候之外，说了点文革研究事，尤其四川文革研究。但谈的不深（电话里无法深谈），彼此谈点看法谈点现状而已。这种电话，以后还打过两三次，都是我主动打，一般通话二、三十分钟。

10月下旬或11月初，何蜀兄发来石名岗先生执笔的《文革中的山西》书稿，嘱我一阅。不久，又发来伦佐兄写给他的，读了此书稿前言的一篇随感。这就是后来发表于《昨天》，并其后收入正式出版的《文革中的山西》“附录”中的《观察文革历史的五种观念视镜及其他》一文。读过这篇随感，就我自己来说，大有耳目一新之感。而且真心诚意地认为，伦佐兄的理论素养，思想深度，以及研讨问题的视野，切入角度的选定等，确实在我等之上。我给何蜀兄发的邮件中也对此赞曰：“不得不对伦佐兄高看一眼。”这篇文稿，伦佐兄对包括海外学者在内的文革研究者，其思想观念类型的梳理与归类，除了需要学养见识，想必还需要一点胆识和魄力。有些人（尤其体制内人士），若自行对号入座，肯定会得罪好大一批。周伦佐其人其文，于此可见一斑。

转眼2015年春节，在一堆亲朋好友的贺年问候短信中，竟然有伦佐兄发来的一条贺岁短信。平时年节，我不习惯这类应酬，电话也好，短信也好，除极个别外，大都疏于问候，一般只收不发。没想这年，伦佐兄却首先发来贺岁短信。有点意外，也有点高兴。当即也回一短信，向伦佐兄贺岁并问候。

自从在省城收篷回自贡后，一般来说，每年我都会去省城三两次。或有事，或访友，或去送仙桥市场寻购小报。然2015年，整整一年，却没上省城去过。一是没什么特别事，二是其时正着手自己第三部长篇（关于当地保路运动及辛亥革命）的写作，时间安排较紧。

哪知到了年底，阿强来了两三次电话，说伦佐兄近来病发，情况不大好。再三邀我赴省，一起去看望。怕我不去，阿强甚至说，此行成都的旅费，可以由他来替我承担。听阿强口气，好似伦佐兄余日无多。阿强把话说到这种地步，自己也真怕伦佐兄有什么不测，第二天，即丢下手中事，匆匆去了省城。

我和阿强赴伦佐兄处探望，是我抵成都的第二天下午。原听说伦佐兄住在郊县，C提供的房子。其实就在南二环边上一普通小区，离市中心倒不远。阿强先联系过，知道我们要来，伦佐兄还特意在楼下单元门口相迎。

相见之下，未有病入膏肓的样子，精神状态似乎比第一次见到时还稍好。住所二楼，很平常的二居室。这次探望，我得以亲睹及感受伦佐兄平时的生活环境和生存状态。

茶叙在客厅，主客就我三人。因伦佐兄一直个人独居，缺了点居家所称的“人气”，住所就显得特别阴冷，似乎寒气很重。又时值冬日，窗外是或浓或淡雾霾，总是阴沉沉的灰色天空，不时冷风袭入，令人寒意顿生。伦佐兄又是“寄居”，举眼四望，虽不说家徒四壁，也真没什么像样的东西。文化人通常离不开的书报杂志也极少，连书架书柜之类也见不到一个。彼时彼刻，我心中不禁一丝悲凉感涌上来。

伦佐兄自己，可能长期独处于此习惯了，全不在意，反是因我俩的造访而显得谈兴很高。那天多是我和伦佐兄在谈，阿强仅是偶尔插插话。最主要的话题，当然是彼此都关心并有兴趣的文革研究。其间，我谈及想写一部关于文革四川“二月镇反”的书稿。一直想写这书，原因是自己经历过“二月镇反”，见证过许多人与事，感触很深。后来又收集了大量资料，心中有数。自贡造反派狱中绝食事件，不过是其中一节。还有规模声势影响更大的成都造反派狱中绝食，以及引发镇反的冲击成都市公安局的“一·二九事件”，中央高层对“二月镇反”前后不同的态度，等等，真相都有待揭示。伦佐兄对此大为赞成，说，搞这样一部书稿有价值。又说，不仅是四川文革史研究，都算填补一个空白（可惜后来有关部门明确警示我不准搞了，否则将查处，我被迫停笔）。

那天谈得最多的，是C正拟进行的四川文革史研究项目。伦佐兄对我说，C搞的《赵紫阳文集》，已告尾声。现正组织人马，全力弄四川文革史研究。C对此的心思和设想都很大，在成都已找了两拨人来开会座谈。听伦佐兄口气，C对座谈者及情形似乎不太满意。

我这才记起，大约一个月前，C给我来过一次电话，主要谈关于赵的一个什么资料。后来谈到，说打算搞一搞四川文革研究的什么课题，问我能不能参加一下？我含糊地应答着，没说参加，也没说不参加。但C没提开座谈会的事。

伦佐兄叹口气，说，C想让他来主编，但他如今身体这个样子，肯定无法做具体事。所以只能答应C，最多审审稿。伦佐兄当时的意思，希望我能参加进来。由此，他还谈及我那《自贡文革大事记》，对我说：“王锐兄，你知不知道？你那个《自贡文革大事记》，增加一个自贡文革人物这方面的内容，基本上就是一部《自贡文革史》。你恐怕自己都没意识到吧，无意中就弄出了一部《自贡文革史》。”又说，四川文革史，也可这样分成几个方面，大事记，四川文革人物，四川文革主要事件，等等，分头完成。我参加进来，可负责其中一个部分。他知我在搞四川文革大事记。熟悉情况，理得清脉络，资料也多。

接下来，伦佐兄还为 C 说了许多好话，说 C 这个人，执行力特别强，要做什么事，就一定要办成。比如，出《赵紫阳在四川》和《赵紫阳文集》，就是如此，又说 C 的第二个优势，是认识许多人，有人脉资源，国内许多搞文革研究的著名学者，他都认识并有交道。

这时，阿强也插进来说，老王这次来成都，最好去见见 C。伦佐兄也建议我，趁此行该去见一下 C，谈谈四川文革研究课题的事。对此我没表态，也意识到，阿强一再催我到省城一趟，探望伦佐兄恐怕在其次，主要还是想让我介入 C 的四川文革研究项目。

伦佐兄又谈及我写小说的事，说写那种盐商小说，不大有什么前景（上次访 C，我分别送了 C 和阿强一册前几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盐商世家》。伦佐兄想必知道亦不看好，故有此说）。又称，我写的文革研究文稿，完全看不出是一个在自贡的人写的。伦佐兄的这番话的意思我懂，认为我弄文革研究，比写小说更让人看好。反之，似乎认为我写小说，不会有什么出息和前景。

那天下午茶叙，其间还有一个小插曲，这就是我试图想让伦佐兄证实，关于为 C 作传或写回忆录，当年是否有过他提出较高开价的事？这事一直有坊间传言。但另有消息说，没有其事。虽然有些冒昧，我想想，终于还是当面提出来了。这显然让伦佐兄感到某些不快，并直接把这种不快表达出来了。但他当场也直截了当回答了我：“确有其事。”还讲了当时与 C 谈定，具体报酬为 50 万元（比我听到的传言少）。而且双方还签了协议。至于为什么最后没写，没执行协议，伦佐兄没讲。听口气，好像是他自己不想写了，所以此事最终未成。

那天与伦佐兄的茶话，持续了两个多钟头。总的看，其精神状态尚好，谈兴也高，中间没一次需要吸氧的情形（进门坐定，就看见伦佐兄座位一侧的上方，挂着一只氧气袋，似随时备用）。5 点多钟，看时候不早，他请来做家务的钟点工大概也快来了，我和阿强就告辞。

伦佐兄还带点歉意地说：“本来该用常规接待客人的，这一阵身体不好，无法用常规接待。很是抱歉。下次来，争取用常规接待你们。”我明白，伦佐兄这里说的“常规接待”，就是留客用餐。我和阿强都连称不必，挥别辞之。

此时已近黄昏。省城街头虽北风劲吹，大道上依旧车水马龙，周围各色行人来去匆匆。时值岁末，还有两天，日历将翻过新的一年。无论眼下处境如何，大局怎样不堪，但面对新的一年，总得有所期待才好。但先前访周所见所闻，多少有些令人悲凉地想到，独居寒室一隅的伦佐兄，与眼前这现实世界，此番生活场景，确实有点距离了。

第二天，我见了一位省城朋友后即打道回府。我没去见 C（我真怕他再让人收我的手机，让我这不值钱的手机又报废），也没去电话。他能否真把四川文革

史研究项目做起来，我不知道，但我不想介入。

六

一直以为，伦佐兄因故全无收入，其生活包括治病，都是 C 在资助。坊间多是如此传闻。这次访周后，才知其实并非如此。伦佐兄每月仍有 2000 多退休金，维持个人生活不会有问题。问题是他请了个保姆，钟点工，每天定时来，帮助买菜等，做点家务，每月近 2000 的工资。这些须他写文发表（如《领导者》及海外某网站），得点稿费弥补。可见他的生活不是由 C 资助，资助的，仅是免费提供的那套两居室住房，以及有时住院医疗。而另有相关人士说，本来伦佐兄所请钟点工，开初也是 C 出资，但后来 C 说有困难不出了，由伦佐兄自己出。

访周后也才知道，伦佐兄其实有家人有后代，并不是如坊间传言那样，一直在外漂泊闯荡，始终单身。至于伦佐兄如何弄成家人不在身边，个人长期独居的现况，涉及隐私，不便过问。但显然，这种长期独居生活，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他的健康，使病况加重。

那次我从省城返家不久，就收到伦佐兄发来的邮件，附有他以前的几篇文稿，过去多未读过。其实这是他发给那天同访文友阿强的，后来又发我一阅。过几天，一连两个晚上我将那些文稿仔细读了。实在说，读罢感触不少，一是如前所述，在学养、见识、经历、才情等方面，伦佐兄真有其优势；二是迄今为止，伦佐兄见诸笔端的，仅是很小一部分；其三，好些东西若不抓紧成于文字，化作成果存世，可能再无机会了，实在可惜。

基于这些，我给伦佐兄写了一个较长的邮件，谈了以上看法，并建议其在可能情况下，最好抓紧时间，择其最重要最有价值者，或文论，或回忆录，立即着手动笔。在有生之年，能完成多少是多少。我还特别说，其他人我不觉遗憾，因其学养，才情等不够。而对你伦佐兄，特觉遗憾。这点，我说的是真心话。

没想到，邮件发过去了，一直未得回复。对此我多日不解。思之，自己似乎是不是热心得过了头？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尤其像伦佐兄这样内心比较敏感的人来说，话说多了，说深了，反而不好。后来有友人对我解释，此时周兄已病情加重，哪有心思和精力再来弄你说的那些？

那天在居所拜访时，就听他说，下周将到医院住院，C 已作了安排。也不知那次入院治疗情形如何。转眼 2016 年春节，我向伦佐兄发去贺岁短信。是否有回，我已没印象。

开春，气候稍暖，这对气管或肺部有毛病的人是福音。我试着给伦佐兄发去问候短信，关心其健康。伦佐兄很快回复，说刚出院不久，正逐渐恢复中。

我早年也有气管支气管方面的毛病，一度也很严重。求医求药之余，遍访当地名医，寻解脱之道。有次，疗养院一熟识老中医告我一呼吸疗法：不管散步或室内坐卧，坚持习练深呼吸，而且一定要做到呼长吸短，如计数，可呼六吸四。我照行且坚持多年，果大有好处。原本体弱的我，如今支气管肺功能在同龄人中，竟然算比较好的。而且近年看资料，亦有名医如此荐之，可见不邪。

我当即给伦佐兄发去较长短信，详告此习练深呼吸之法，劝他不妨一试。

6月初，突然从微信中，见到为周伦佐治病网上募捐的消息。消息称，文革学者周伦佐因病陷入生存困境，为治病，不得已在网上公开募捐。还附有伦佐兄正在医院输液，以及病历等照片……伦佐兄走到这一步，这是我当初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相当震惊。又急忙与阿强联系，求证此事。阿强很快回复称，确有其事。又说，伦佐兄以前的治疗费，是C在资助。但近来C也有困难，生意不好。所以只好向公众募捐。

本来拟亲赴省城一探究竟，天热，行期推迟了。况阿强后来通告情况称，募捐效果还很不错。也就没太在意。但10月中下旬赴省，确在计划中。哪知，未及成行，就传来伦佐兄辞世消息。未及见伦佐兄最后一面，实为遗憾。

七

伦佐兄过世后，微信上见到纪念非非主义三十周年——《非非》杂志“介入中国”专号出版消息。该专号16开，篇幅达58万字，由周伦佑主编，孟原任执行主编。六个栏目中，最后一个栏目为“学术禁区：文革研究”。并介绍称：“集中刊载大陆体制外学者周伦佐的文革造反派研究”专题。目录所见，其栏目文章分别为：1.文革叙事中造反派问题的五种话语形态，2.造反红卫兵与保守的区别，3.文革中受迫害的造反派，4.血色青春的纪念，5.还原文革造反派真相。除最后一选题注明由周伦佐、周伦佑合著外，其余皆周伦佑所著。

专号注明出版日期是2016年7月4日。正是伦佐兄病重之时。作为主编又是伦佐胞弟的周伦佑，想必见其兄病重成那样子，特在与文革研究毫不相干的“纪念非非主义三十周年专号”特开一个栏目，以较多篇幅刊载伦佐兄关于文革造反派那些论述，用此向世人彰显周伦佑文革研究成果。

关于周伦佑，如何评价其人其事？对历史人物事件，或当代某人某事，我很赞成一个说法，即：知人才能论世，知世才能论人。还有一个说法，叫做乱世出英雄。伦佐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英雄”，但是他却生于乱世，经历并成长于文革这种“惊天乱世”，才有他对文革那种深入洞察与剖析，也才有对文革造反派那别开生面，不流于浅薄的见解论述，获海内外尊重好评。

开初，听到伦佐兄为病患于网上公开募捐，我还颇有些叹息和不理解。心里感叹：怎么会到了这个地步。直到读了著名学者刘瑜女士文章中一段话，才多少对伦佐兄生前那种选择，有了更深体会和理解。刘瑜写道：“尊严这个东西，其实是和欲望成反比的。你想得到一个东西，就会变得低三下四，死皮赖脸，而当你面对眼前这个人，这件事无动于衷的时候，尊严就会在你心中拔地而起。”我想，伦佐兄如此举措，恐怕正是想极力保持自身一个文化人那份尊严，尤其是作为一个体制外知识分子的那种尊严。

难怪对伦佐兄突然辞世，何蜀兄叹息说：“这对于他，也算是解脱。”

最后要说的是，周家两兄弟至今体制内似乎仍不受待见，但在体制外、在民间，却有广泛声誉影响。最新的一个事例，我一位诗人朋友，小十来岁，文革当过小造反派（红小兵），以后做知青。八十年代开始文学写作，至今在当地仍是相当活跃且势头很好的诗人，时有诗集出版。他对周伦佐、周伦佑两人，相当推崇敬慕，可惜无缘一识。近年得知我与伦佐兄有联系交往，几次说起，哪天一同赴省拜访。可惜种种原因，一直未成行。

本来说好这 10 月下旬我两人赴省，看望病中之周伦佐。哪知未曾动身，却传来伦佐兄已走的消息。那个晚上，我将消息告诉他，其震惊痛惜之余，当即作了一首悼念伦佐兄的旧体诗发我。似意犹未尽，连夜再写一首自由体诗，第二天一早发我，再寄哀思。

诗写得不错。全诗不长，经这位名叫辜义陶的诗人朋友同意，转引在这里，作为本文结尾，以表达对已逝伦佐兄共同的悼念之情：

挽歌

——悼周伦佐

连招呼都不打一个，你
就这样悄悄地走了
在这一个寒冷深秋
枝头叶片在风中瑟瑟颤抖
雪，不落在大地
而落在每一个惦记你的心灵

两手空空，
你没有带来瑰色花朵
只留下了黑铁般文字

与一身的疼痛

我的好兄弟，我们该什么方式
为你送行
花圈，表达不了追思悲愤
哀乐，只属于平庸的人

我们不会哭
我们眼中泪水，在那些年代
早已经流干
我们的血
已将脚下泥土灌溉

太多的苦难之后
我们学会了平静
面对死亡
我们也敢放声高歌

去吧，兄弟
带着你的遗憾，你的微笑
去到另一个世界
依旧用你倔强的笔
书写整整一代人的诺言
和一个人的思考

2016年11月初 于自贡危楼书

【忆旧思亲】

秋风萧瑟送伦佐

林 雪

作者简介：林雪，女，1951年生于重庆，当过7年知青，11年工人，报纸和广播电台编辑。以纪实性写作为主业，作品有《“双枪老太婆”陈联诗自述》、

《田家英在大丰》、《我向中央说实情》等。

我与周伦佐只有一面之交，但是知道他的事情却在十来年前。其时我在写一部关于成都知青在西昌地区插队的书，查资料的时候知道当时西昌地区有周氏兄弟，一个以诗歌闻名，一个以理论闻名，后者就是周伦佐。后来在朋友圈里听到他的很多轶事，见面却是在2014年春天一次圈内的聚会上，大家为一位写作遇到难处的朋友出主意。

此时我看到的周伦佐，六十出头，个子不高，面色发黄，说话有些吃力，明显是有肺疾。他的发言具体内容记不清了，留下的印象是很透彻，很到位，却是以热情鼓励为主。聚会之后我们同车，司机先送他回家，然后再送我。车上闲聊，隐隐知道他是独居，又不大会照顾自己，说到他的身体状况，果然是肺不好，而且多年。我给他出了个食疗方子，因为简单，他很乐意接受。以后他来短信致谢，我回信时说了句“要对自己好一点”。他大概觉得我在“教训”，从此没有回话。这位老兄的倔脾气，果然是名不虚传。

以后我们之间通过朋友，还是有些交往。一次他与重庆的文革学者何蜀不知道怎么谈到我，很关心我的写作，提出了些建议，这些话都由何兄转告于我，透出了他的古道热肠。

再后来就到了今年的5、6月间，他贫病交加，病重住院，圈内的朋友们为他发起募捐，募捐的行动溢出了朋友圈，甚至蔓延到外省的一些大学，许多人为这个素不相识、而且也不“热门”的人慷慨解囊。我亦捐出了半个月的工资，在短信中安慰他不着急，慢性病，靠养，还说大家都很关心你。

6月22日，他病情稍有好转，给我来了一个电话，电话中的他很感慨，说林雪啊，我这个人，你是不知道，我成天把自己闷在家里，与世隔绝，我以为这个世界已经把我给……可是我没有想到，还有这么多的人关心我。我真的是很感动啊，我昨天晚上夜未睡，写了一首诗，我念给你听……可是我实在不大听得懂他浓厚的西昌方言，只是听出他很累，说话很吃力：他的肺里满是大泡，功能只剩下10%，不能说很多的话。于是我撒了个谎，说老周，我这里信号不大好，你快别说了，好好休息，待我有空就来看你。

他说你别来，医院不是什么好地方。

可是我家务事务缠身，居家之地离他的医院又远，一直都没有能够去探望。转眼夏天过去了，立秋之后，成都一反常态，巨热，我有点担心，给他去短信问候，也没见他的回复。后来与重庆的何蜀通电话，何兄问起老周，说是打电话他也不接，病情到底怎么样了？我忙向朋友李亚东打听，亚东说上周还去看过他，有好转。我稍稍放心，以为他出院回家休养了。

秋深了，黄叶飘落，冷雨敲窗，10月20日，我突然接到一封从伦佐手机发来的短信：

各位好，我是周伦佐的女儿。家父自今年五月入院后病情多次反复，于8日入住重症病房进行插管治疗。今天探视时医生说他的情况非常危险，极有可能熬不过这几天。在这里我也转告大家，如果有意愿去探望，可于每天下午探视时间（4点—4点半）前往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第二住院部3楼ICU病房的39床。感谢大家至今的关怀和支持。

最后的落名是：周梦笛。

不能再耽搁了。我与何蜀通了个电话，第二天下午坐地铁转公交，花了一个多小时满头大汗地赶到医院，探视已经开始。ICU门口的护士说已经有两个人进去探视39床病人，得等他们出来我才能够进去。一转眼还剩下十分钟，那两个人还不出来，我对护士说麻烦你去喊一声，我这么远赶过来，总不能……又过了一会儿，出来两个人，其中一个年轻女子，我以为是老周的女儿，一问才知是蔡文彬的属下。蔡文彬是朋友圈中的大老板，文革中成都一派红卫兵的头头，当时属老周所在组织的对立派，近年与老周相识后却意气相投，佩服老周的才气，也请老周帮他编写和审读些东西，在老周重病期间帮了很多忙，还派了人天天来医院探望，了解病情。另外一个满脸大胡子的中年人，廖洪明，画家，昨天晚上才从南非回来，接到梦笛的短信就赶来看望，说是月初走的时候老周的情况还好，估计他怎么也能够挺过这个月，没有想到会这么快……

我随老廖进了病房，老周罩着面罩插着管子，呼呼地打着鼾，睡得很熟。我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很温暖；我喊着老周老周，我是林雪，来看你了；他酣睡依旧。我突然有些哽咽，说何蜀让我代他向你问个好。他还是不搭理。我看了一眼旁边的监视器，心速137/分钟，据说早上曾经达到150/分钟，而正常人心速才七八十，这样的心速表明由于心脏功能极度衰竭，依靠正常的心跳已经不能维持他的生命，只能靠加快心速来代偿运转，是维持不了多久的。病房的特护告诉说，他前天就开始深度昏迷，不可能苏醒了。还说他的整个情况都很危险，还有两三天的时间都是过于乐观的估计，很可能今天晚上就过不去。

看来我是没有机会和他说话了，心底陡然升起一种悲凉。

一个思想者，就这样怀着深深的绝望，背对着这个世界渐行渐远。他那些已经出版和还没有出版的书和文章，影响了很多并且将继续影响下去，他带给了这个世界丰富的精神，却毁掉了他自己。（下图：最后一次住院时的周伦佐。选自廖洪明博客。）



和那些熟识的朋友相比，我见的周伦佐只是一个远远的影子，可是就是这个影子，令我想起了《牛虻》中的亚瑟和《日瓦戈医生》中的那个革命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冷峻，而这样的冷峻来自于他们痛苦的经历。老周去世的当天有学者秦臻著文说：“周伦佐先生的一生被框限在一个黑铁浇筑的社会结构中，几十年间，其生活、思考、写作，皆以痛苦为药，与绝望为伴。”正因为这样的原因，他才对那次募捐感动至深，曾经对募捐的发起人张明说等他病好些，他会把那些捐助人的名单提供出来，请张明代他写篇文章，感谢所有在他困难时候伸出援手的朋友。可是这个写过许多哲学和心理学著作的老周，能够分析世界和人心，却不能改变自己。他把冷酷的环境造成的心理创伤，内化成了极端的坏脾气。在朋友圈中他以喜欢争执出名，且态度强硬固执，若是遇上同样强硬对手，双方免不了一番舌战，最后他却以气力不济而告输，令人忍俊不禁。他的坏脾气也造就了他个人生活的不幸，三十年前那个听了他的演讲而迷恋他的女孩对闺蜜说：我所有的寂寞都是为了等待他的到来。然后就做了他的妻子。可最后还是离了，而且在他重病期间也少有探望，可以想象是被他那坏脾气伤透了心。也是因为这样的坏脾气，老周时常与弟弟周伦佑吵架……

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立志要改变世界的人，都不大在乎人间烟火？老周也未善待自己。据说他独居以来，日子过得相当粗糙。他抽烟很厉害，为了他的健康，包括何蜀和老廖在内的很多朋友都劝他戒烟，他却执意不肯，说没有烟我怎么写作？可是后来病重，不得已把烟戒了，写作还是在继续，只是写作与生活都很艰难了。他有很多朋友，很多读者，甚至有很多崇拜者，可是他的内心始终痛苦孤寂，也许他只有在这样的痛苦中才能够打磨出那些深刻的文字，使得那些蘸着他生命的墨汁写下的文字尤为珍贵。可是这也严重吞噬着他的健康。

接到老周去世的消息之后，我给他的女儿发了一个短信：

梦笛，你爸这辈子过得很苦，其中既有他性格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因素。他的悲剧是一代人的悲剧，愿这样的悲剧随他而去，不要在你的心里留下阴影，也愿他在天堂改掉他的坏脾气，过得快乐一些。

辛苦你了，孩子。

林雪阿姨

老周葬礼之日。我委托亚东代我和何蜀去参加，自己则在家里紧赶慢赶完成了此文，然后向着葬礼的方向点燃稿纸，让它化为一缕青烟，送老周远行。愿所有像老周那样致力于过去现在或者是将来的朋友，一定不要放弃你自己。要记住我们是为了美好而奋斗，生活再是曲折再是艰难，也有它温馨的一面。何况社会总归要进步，我们得看着它慢慢变好。

对自己好一点，朋友们!!

2016年10月25日 写于涵秋馆

【书海泛舟】

《“文革”造反派真相》目录

周伦佐

一架疯狂的飞机突然撞毁，庞大的机体炸裂成碎片。记录事件经过的黑匣子丢失了，无法知道其中的真相。——这是今日眼中的昨日“文革”。

机上的乘客全死了。因为黑匣子丢失，他们和机组人员一起都成了可能的罪犯。——这是今日眼中的昨日“造反派”。

——作者题记

目 录

序（宋永毅）

前言

第一篇 造反红卫兵与保守红卫兵的分野

第一章 完全对立的等级要求和行为指向

第一节 保守红卫兵：特权阶层子女的恶性表演

第二节 造反红卫兵：弱势青年绝境中的反抗

第二章 对造反红卫兵的误指与妖化

第一节 失忆与误指

第二节 附势与妖化

第三节 良知与真相

第三章 造反与保守之间的主要界线

第一节 认定造反红卫兵与保守红卫兵的历史范围

第二节 两种红卫兵在共同青春期背景下的行为差异

第三节 造反与保守的根本区别

第二篇 三年造反与十年“文革”的区别

第四章 造反派的有形构成与无形演变

第一节 造反派的构成

第二节 造反派的分裂

第三节 造反派的成份演变

第四节 三年造反不等于“三年文革”

第五章 有名无实的造反派掌权

第一节 造反派掌权时期

第二节 军人掌权时期

第三节 干部掌权时期

第六章 受迫害的造反派

第一节 “文革”中的三次政治迫害

第二节 试探“二月镇反”的内幕

第三节 “文革”后的政治迫害

第三篇 造反派同毛泽东的合与分

第七章 毛泽东的个性特征与理想实质

第一节 毛泽东的非制度化个性行为

第二节 毛泽东的反历史社会理想

第八章 造反派与毛泽东的利益契合点

第一节 毛泽东的政治假想敌与“文革”的爆发

第二节 毛泽东与青年学生和下层民众的利益契合

第九章 历史的误会

第一节 造反派与毛泽东的利益分离

第二节 1972—1974：为落实政策被动造反

第三节 1976：造反派对毛泽东最后召唤的微弱回应

第四节 最不应该发生的误会

第四篇 造反派在现代性进程中的特殊站位

第十章 极权体制下变态的民主运动

第一节 民主要求与专制威权的对立

第二节 造反运动与民主进步的间接联系

第三节 造反派与“右派”的真实关系

第四节 官方话语中左右概念的颠倒

第五节 造反一代的双重有效资源

第十一章 在苦难中摆脱异化的第二代人

第一节 中国现代变革遭遇的文化阻碍

第二节 八代人在中国现代文化转变中担负的使命

第三节 新三代人的历史遭遇与群体觉悟

第四节 “文革”一代的惊醒与疏离

第五节 三代人逐代加速的疏离步伐

第六节 “文革”身上的第五张皮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文革”造反派真相》前言

周伦佐

不知从哪一天起，“造反派”变成了“文革”的同义词。人们提起“文革”便会说到造反派，提起造反派便会说到“文革”，造反派成了一群以“文革”为舞台坏事做绝的历史罪人。

对造反派的认知并非历来如此。“文革”时期人人都知道，造反派特指那些首先在本单位、本地区造当权派的反，观点激进、口号极端、行为激烈的群众组织和群众派别。就是在“文革”结束之初的官方文件和民众常识中，造反派的界限也十分明确：特指那些过去造过当权派的反，眼下正成为“揭、批、查”运动严惩对象的人。虽然80年代初胡耀邦说过“文革”中的两大派都是造反派，但那是为了防止原保守派群众乘机对造反派反攻倒算引发新的派性斗争所采取的权宜之计，事实上在同时开展的“揭、批、查”运动中，官方并没有忘记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区别。

只是在后来，造反派这个名称才逐步变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泛指词：“文革”中的造反红卫兵和造反民众是造反派，运动初期的官办红卫兵是造反派，进入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军队代表、干部代表、群众代表是造反派，开进各单位“支左”的“军宣队”和进驻文化教育领域的“工宣队”、“贫宣队”是造反派，甚至以林彪为首的高层军人政治集团和以江青为首的高层文人政治集团，也成了造反派¹。造反派真是成了一个垃圾箱，什么脏东西都可以往里装。

于是，不仅揪斗当权派和大搞武斗之事理所当然归到造反派名下，而且，“文革”初期以“教育革命”之名层层批斗普通教师，以“破四旧”之名肆意毁灭优秀文化遗产，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之名残酷迫害高级知识分子，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名凶暴虐待“黑五类”及其子女，以及“文革”后七年各级革委会和司法机关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众多官方运动中所制造涉及数百万人的冤、假、错案，都毫无例外地记到了造反派账上。至此，造反派终于成了“文革”舞台上人性丧尽的恶势力的代名词，在中国现代史上，恐怕只有万恶的日本鬼子才能与之比丑。造反派完全妖魔化了。

按理说，1966—1976年卷入“文革”漩涡的八亿中国人，现在大多健在，无论当初他们是造反派、保守派还是逍遥派，对这段历史以及造反派在其中扮演的

¹ 朱学勤这位对造反派真相颇有洞察的学者，也会不自觉地将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集团称为“造反派”。见所著《书斋里的革命》，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年12月，第367页。

角色，应该还记得清楚。可是，我们很少听到说明历史真相的声音。

这不奇怪。造反派的妖化，原本是享有公共话语权力的“文化精英”们造成的。多数民众，历来只有听话权而无说话权，他们不仅无从传达自己的声音，而且很容易被公共话语反复发出的声音所同化。

造反派的全面妖化，大约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当时，部分文化人为了抗议官方针对知识分子的“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维护并争取自身的言论权利，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一个令官方无可置疑的话题：“文革”反思。本意自然是借题发挥——通过回顾“文革”中的种种反理性反人道现象，来控诉极权主义“封建法西斯专制”的暴行。这些控诉者大多在“文革”中遭受过来自不同方面和程度不同的迫害，为了叙述方便，更为了与官方口径保持一致，他们便将各种各样的加害人统称为“造反派”。

这是在否定“文革”的共同前提下进行的。“文革”的最大特征是什么？是造反。否定“文革”自然就要否定造反。官方重点否定的明明是 1966 年 10 月以后在“路线斗争”模式下罢他们官夺他们权的“造反”，知识分子重点否定的明明是 1966 年 10 月以前在“阶级斗争”模式下整他们人抄他们家的“造反”，现在却用一个抽象的“造反派”名称——既包含了两种所指又达到了口径一致。

后来的“文革”反思话语逐渐习惯了这种笼统的提法；到 90 年代末“文革”反思行为达到高潮时，这种提法不仅约定俗成，而且逐步深入人心——几乎成了公众的共识。

文人们将“文革”中原本出自官方和保守红卫兵的种种恶行统统归到造反派名下进行鞭挞的招式，虽然避免了政治风险并增强了轰击“封建法西斯专制”的火力，却无意中歪曲了原本清清楚楚的历史事实。歪曲的结果，不仅使参加过造反的人承受很多莫须有的罪名，而且给身处同一话语空间的“文革”研究者制造了一层迷雾。

少数人的记忆偏执不应该泛化为群体性的记忆偏执，少数人的历史失忆不应该泛化为群体性的历史失忆。为了对历史负责，必须恢复造反派的本来面目——既不神化，也不妖化，而是人化。

造反派问题研究至少已有五种话语形态：一是官方式的否定；二是海外极左派和国内极右派式的肯定；三是海内外自由派知识分子式的否定；四是海内外平等派知识分子式的肯定；五是既不否定也不肯定的客观式论述。

这五种话语形态又可从对造反派的价值评判上分为三大类：否定、肯定、不作肯否。在我眼里，客观式论述的第三类话语最能体现公正、严谨和兼容，至今只为海外宋永毅、华新民和国内何蜀、叶曙明等少数学者在沉着建构，实际凸显于公共话语空间的只有否定和肯定两大类。

在否定类话语中，以昔日严家其和今日金春明为代表的官方式否定话语，由于体制立场的深深拓印和体制视角的长长轨迹，经受不住人心的评判和时间的检验，诞生之时学术生命即已终结。

在肯定类话语中，海外极左派和国内极右派式的肯定话语认为：现在的中国，修正主义上了台，走资派得了势，资本主义复了辟，工农大众遭了罪；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和群众造反运动仍然有效。因为完全囿于毛泽东反历史的话语体系并忽视“文革”结束后中国的历史进步，它除了能在西方反体制青年中激起小小狂热和在国内少数人心中引起大大联想，并没有独立的学术意义。

于是只剩下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否定式话语和平等派知识分子的肯定式话语。两派中人都是民主知识分子，只是前者更看重知识分子的自由权利，后者更看重下层民众的平等利益。称前者为自由派，属于他们的自认和海内外的共识；称后者为平等派，是因为他们的视角和言说尤其注重社会平等。从国内舆论和海外中文刊物 20 世纪 90 年代围绕造反派问题所发生两次辩论的资料来看，不仅大陆如此分野，国外也这样划界。

这很正常。过去不久的“文革”事件给中华民族留下的深刻创伤和重大影响，使每个人心里至今仍保留着不同程度的痛感和刻痕。对于在这个事件中先风光一时后遍体鳞伤的造反派，即使站在体制外的评价，人们也不能不在思想和情感上带着强烈的褒贬色彩。我自己理智上希望客观公正，情感上却也难免倾向平等派的肯定式话语。至少现在，不偏不倚的客观式话语形态还不可能完整呈现。

这两种话语与官方式话语和海外极左派及国内极右派式话语的最大区别，是它们都站在体制外，而且都以否定“文革”为言说前提。

两者之间的分歧仍然很大：

自由派抱定进步观念，认准包含着多元主义文化、民主主义政治和自由主义经济的社会制度是中国历史的下一站目标，并将社会利益、理性诉求、和平方式、法制秩序、制度建设、经济发展，视为实现这一进步的基本途径和基本内涵。他们由此认为：造反派服从毛泽东的错误政治导向，目无法纪践踏人权乱揪乱斗并自相残杀，停工停产大搞破坏造成国民经济接近崩溃，最后导致几无一丝自由气息的极端专制。从社会进步的要求来看，造反派的历史作用理应否定。其言说者，主要包括国内外的徐友渔、朱学勤、丁东、李辉、萧功秦、严家其、刘再复、胡平（美国）、侯一谦、徐明旭等一批言及“文革”造反派话题的自由派知识分子。

平等派立足正义观念。在他们眼中，“文革”前十七年推行的政治等级主义，已将社会成员之间的政治不平等推至极端，人际关系已经紧张到了必须打破的地步。政治上遭歧视受迫害的庞大弱势群体遍布国中，个人权利几乎被剥夺殆尽，人生境遇更是处处险阻，他们在可能的时机所进行改善现实政治处境和争取自身

平等权利的行动，于情于理都无可厚非。造反派主要由渴望改变现状的社会弱势群体构成，毛泽东所发动的“文革”和所宣扬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只为他们提供了反抗政治不平等的现实可能性，他们并非完全被最高领袖所利用。从1966—1969三年群众性造反运动的实际内容看，他们并没有太多偏离由切身感受所激发的反抗要求。虽然自相残杀必须谴责，但十年“文革”中更多罪恶的责任人并不是造反派。他们最初造反的原因和造反过程中多次遭受镇压的缘起，都表明其反抗行动的正义性。他们造反失败后的心理应激和精神反思，也为今日的社会进步准备了人文条件。现在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客观上应和官方话语，不仅完全否认这些事实，而且对他们1976年至今遭受的政治迫害和社会歧视也熟视无睹，表现出了巨大的社会不公正。这一派的言说者，主要包括国内外的刘国凯、杨小凯、陈佩华、郑义、华林山、印红标、胡平（中国）、叶长青、陈益南等一批言及“文革”造反派话题的平等派知识分子。

事实上，两种体制外话语之间的具体分歧比我简单归纳的还要多，各自言说者的名单，更能超出列举人员的许多倍。我的归纳和列举只限于自己狭窄的感知范围。而且，两派言说者的倾向也并非一成不变。例如：自由派的朱学勤也曾对造反派的受迫害遭遇深表同情；平等派的郑义在揭露广西人吃人事件时也曾无意中往造反派脸上抹黑。自由派的丁东和平等派的印红标，又都表现出客观性的倾向。

比较而言，在海外公共话语空间，似乎平等派的声音更为响亮，自由派的声音相对微弱；国内公共话语空间正相反：除了自由派的声音此起彼伏，几乎听不见平等派的声音——这自然和官方的言论控制有关。

两种话语虽然都以否定“文革”为言说前提，但对造反派的态度又不相同。自由派把造反派和“文革”视为一体给予否定；平等派试图把造反派从“文革”中分离出来给予肯定。

两种话语的言说文本也各有特点：

自由派为了证明造反派的行为属于非进步甚至反进步，更偏重论说造反的结果，在挖掘与正义问题紧密相连的造反原因时不能不有所回避。其文本虽有可以说服人的学术理智，却缺乏能够感动人的道义激情。

平等派为了说明造反派的行为属于正义性反抗，更偏重分析造反的原因，在阐释与进步问题密切相关的造反结果时不能不显得牵强。其文本虽然饱含足以感动人的道义激情，却缺乏足以说服人的学术理智。

历史研究本来就有双重秉性：当它作为科学时必须讲究学术品质，当它作为人学时又必须坚持道义立场。在造反派问题研究中同时兼顾双重秉性十分不易。两种话语都有所犯难。

文本中道义感的欠缺，无疑是自由派话语面临的突出问题。

道义感——一个人心中带有道德褒贬色彩的情感反应。它源自人类的同情心，又莫立起人类的良知，赋予个人情感以超越自私范围和利己层面的公共评价品性，使人不至于成为只有高智能而无爱憎倾向的机器人。中国人习惯将“天理良心”当作衡量世间百态的标准。这种天人一律的用法并非类比不当。如果说天理的基本法则是保持自然界各种要素和各种物类之间的相对均衡，那么良心的基本法则就是追求人世间各种成员和各种人群之间的相对平等。过度的不均衡和不平等必然导致冲突、震荡和剧变，并导向新的相对均衡和相对平等。对于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应激感受和道德判断，肯定是任何历史研究者都不可或缺的公共情感。造反派问题的研究，同样不可偏离研究者内心的真实感受和直感判断。自由派的文本之所以缺乏道义激情，恐怕就来自——为了观念的真实而牺牲了感受的真实。

由于具有与官方话语相同的否定性向度，自由派招来了“共产党话语系统”和“超事实历史研究”的隐隐责难。这种责难虽然来自海外平等派人士之口，国内不少人其实也有同感。这当然是对自由派的严重误解。相同的否定向度，并不等于相同的否定内容。官方话语否定“文革”造反派，是为了说明现行极权体制的进步；自由派话语否定“文革”造反派，却是为了证明整个极权制度的反动。二者的动机和目的完全不同。只不过，否定向度相似引起的言说纠缠和道义判断缺乏造成的良知倾斜，还是给自由派带来了某种并不情愿的别扭。

为了成全观念而牺牲感受所付出的代价如此之大，自由派并非毫无知觉。他们大多属于亲历过造反然后觉醒的优秀一代，不仅无法抹去当年的切身感受，内心的道义感依然和常人一样强烈。即使在造反派问题上发生如此倾斜，他们中的杰出者也在及时捕捉足够打动自己的新颖信息，以对照自己已经成型的思想走向。我说的是国内自由派话语的主要言说者徐友渔，体现于他对构成平等派“造反有理”说基础的“社会冲突论”和“家庭出身论”的特别关注。他甚至为之使用了只有内心被触动才会出现的肯定语：“这固然是有价值的发现”、“这种观察相当有深度”、“他们的观察和分析也是深刻的”¹，“为还未成熟的文革研究作出了贡献”²。虽然带有明显的保留语气，但是期待深度见解之心还是跃然纸上。

平等派话语的缺陷同样不容忽视。他们试图阐明造反派与历史进步关系的言说大多停留于表象，自然难如人意。事实上，造反派与“文革”后出现的民主运动之间存在巨大的断裂，任何想在其间寻找直接因果关系的努力都是徒劳。造反派中的不少人转变为后来的民主主义者，一般发生在他们与造反运动彻底决裂并否定了自己的造反派身份之后，在认同造反派身份的前提下实现转变者极其罕

¹ 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页。

² 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09页。

见。海外平等派话语主要言说者——杨小凯文章中的道义激情无与伦比。但他 1968 年即已入狱，没有经历这之后才普遍发生的造反一代的精神转变过程，所以其言说不能不弥漫着 1968 年之前的记忆情绪，而对此后造反派身上显现的决裂和转变缺少洞悉。尽管他的历史记忆不失真实，仍然填补不了造反运动与民主运动之间的断裂之壑。另一位平等派话语主要言说者刘国凯比较冷静，为造反派所作辩护也更有力量。但他试图渡过造反运动与民主运动之间因果之河的愿望，因缺少坚固的事实之筏而难以实现。像他这样直接以造反派身份进入 80 年代民主事业的人凤毛麟角，很难视为全国的通例。那巨大的断裂之壑仍然无法跨越。

这不等于说造反派与中国后来的民主运动和社会进步毫无关系。关系仍然存在，只是藏得较深，目光停留于表象，自然难以发现。研究者只有放眼更长的历史链条和潜入更深的历史层面，才能看到其中某种间接曲折隐约的因果关系。

能否站在否定“文革”的立场上，把看似与“文革”这幅历史巨画融为一体的造反派从其背景色中区别出来，从社会正义和历史进步两方面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要做到这一点难度很大，因为诸多现象一开始就搅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为了逼近历史的真实，必须逐层地进行剥离和分析。

这包括：

从性质上分清造反与保守的区别；

从时间上分清三年造反与十年“文革”的区别；

从动机上分清毛泽东与造反民众的区别；

从历史上看到造反一代与中国现代性进程的联系。

从最宽泛的角度考察，“文革”中各种主动性人群的激烈行为，都是社会边缘群体利用毛泽东开展党内“路线斗争”提供的机会，对中心秩序的打破和对自身权利的争取。只不过“中心—边缘”式结构的社会圈层又是多种多样的：有以大民族为中心而以小民族为边缘的族类圈层，有以男性为中心而以女性为边缘的性别圈层，有以成年人中心而以准成年人作为边缘的年龄圈层，有以统治阶层为中心而以下层群众为边缘的等级圈层，在统治阶层中又有以掌握权力者为中心而以丧失或者向往权力者为边缘的权力圈层，在下层群众中又有以红色出身者为中心而以黑色出身者为边缘的成份圈层……。这些社会圈层，大者存现于全国范围，小者存现于一个个具体的企业单位、事业单位、机关单位。如果说 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的学生运动、妇女运动、黑人运动，主要爆发于年龄圈层、性别圈层、族类圈层，那么中国同时期的民间造反运动便主要爆发自年龄圈层、成份圈层、等级圈层、权力圈层——并表现为青年学生造反、非“红五类”子女造反、下层民众造反、机关干部造反。“文革”中这几个圈层边缘人群的借机造反，还包含

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比如学生身上就不只体现着一种边缘特性，而且学生中“红五类”子女和“黑五类”子女的边缘特性及其造反指向，也有完全不同之处。这都需要深入分析和严格区别。

本书试图把造反派从“文革”中剥离出来，从不同方面探寻造反运动的直接正义性、相对独立性、间接进步性——

第一篇和第二篇，着重阐述造反运动的直接正义性；

第三篇，着重阐释造反运动的相对独立性；

第四篇，着重阐明造反运动的间接进步性。

【书海泛舟】

《“文革”造反派真相》后记

周伦佐

写这部书的最初念头萌生于1967年底。当时我所在地区的造反派已分裂为两大派并严重对立，地县两级印刷厂都由对立派控制。为了印制一张我所属派别的报纸，我带着稿子去了一百公里外的凉山州首府昭觉。原以为找到《凉山报》社同观点的造反组织印这张报纸不成问题，没想到昭觉造反派与保守派正发生冲突并波及到了报社内部。我不得不为这张报纸的拣字、排版、校对、制版、印刷而在报社等了近一个月时间。昭觉地势高，这段时间一直在下雪。白天许多时候，我都在报社编辑部的办公室里烤火看书打发时光。办公室几间屋子的角落里堆满了书，多数是中外名著，没有人敢去收拾，更没有人敢于阅读。我仗着是外地人，便坐在火盆边读了起来。《静静的顿河》、《毁灭》、《苦难的历程》、《西欧十大音乐家故事》……。读书之余，有时会静下心来，围绕造反派的分裂和自己怀有的疑惑，对“文化大革命”现象进行思索。我暗自决定回西昌后便退出造反并远离运动，开始有意识地收集运动中的各种资料，为今后写一本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书做个准备。为此，我还给西昌的一位朋友写了一封信畅谈自己的设想。十六岁的年龄，既缺思想资源又无知识储备，这个念头当然只能算是青春期不甘平庸而渴望有所建树的生命冲动。

1971-1973年“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我坐了两年监狱。三弟周伦佑送到狱中来的二十多册厚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成了我抵御精神饥饿和肉体饥饿双重煎熬的唯一依托。在黑牢中对人生之光和国家之光的艰难寻觅，使我第一次有可能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置于近代以来世界历史走向及其变局的框架中来考察。在探索16世纪兴起的民主主义潮流转变为20世纪的民族主义潮流的历史

动因时，我似乎发现了 20 世纪 50 年代“社会主义阵营”民主主义的复兴与失败，同随后中国“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运动的某种关联。写这部书的念头再次浮起并变得有所明确。为此，我用牙膏头和自己才看得懂的特殊符号，在书页的空白处记下了对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一系列问题的思考结论。

1978-1980 年“揭、批、查”运动中，我再次入狱。也是两年，也是靠周伦佑送来的《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列宁文选》、《普列汉洛夫哲学著作选集》等书籍，抵御双重煎熬。只不过这次抵御的不再是饥饿，而是最终打击带来的精神绝望和大病缠身导致的肉体痛苦。思考衔接上七年前第一次坐牢时的进程，并从社会转向了个人。其中必然要牵涉到让我两次身陷囹圄的“文化大革命”。但这时已将它放在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现代变革的人文框架中来考察，从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双重主题的变奏来探寻“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运动的实质及其变态性。写这部书的念头更为确定。

出狱后，严酷的现实迫使我将这件事完全搁下。第一次出狱为“无罪释放”，这一次却是“免于起诉”。尽管我早已从昔日的造反者转变为今日的自由思想者，但头上仍然高悬着“造反派”的不赦罪名。为了改善一落千丈的个人处境，我不得不在罚到生产车间从事苦力劳动之际去挣大学文凭。这之后，自然还要成家并担当丈夫与父亲的双重角色，也还写一些思想锋芒隐藏得深一些的学术性文字。就这样直到 2000 年。

在最初的念头萌生三十多年后，我又才想起提笔做这件事。促使我想做这件事的主要动力，自然不再是早已淡漠的功利需要，而是一种难以释怀的义愤。80 年代以来，国内某些体制内、体制边沿甚至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对“文化大革命”民间场景的歪曲和对民众造反运动的丑化，使我感到良知蒙尘的可怕；而普通群众谈到当年的造反派时几乎异口同声的挞伐，更让我看到这个民族集体失忆的深重。面对这种状况，我既感不平又觉无奈。因为甚至在这种与官方相区别的所谓“民间话语空间”，对“文化大革命”中民众造反运动的否定和控诉，已经成了一种任何人都无力抗拒也无法改变的“公共思维”和“公共话语”。我由此意识到：为“文化大革命”这个历史事件写一点编年史一类的文字，不仅无力完成而且也毫无必要。严格讲，除了历时三年的民众造反运动，这个由极权体制的最高领袖一手发动和领导的反文化“大革命”，并没有任何值得正面研究和正面评价的内涵。于是我决定从还原历史真相的角度写一篇为造反派伸张正义的驳论。为此我写下了作为本书四条梳理线索的四句话：“一是对群众组织要从性质上分清造反与保守的区别；二是对造反又要从时间上分清三年与十年的区别；三是对三年又要从动机上分清上层官方与下层民众的区别；四是对下层民众又要从历史上看到与现代历史进程的联系。”——它们略经修改后成为本书四篇文字的标题。

我将文章暂时定名为《造反派的今日妖化与昨日真相》。最后才改为现在的书名。

这部书虽然由我执笔完成，但实际上又是不少朋友热心帮助的结果。

2001年春节，我对胞弟周伦佑谈了包括四条梳理线索的写作构想。作为一个很具历史厚重感和现实批判性的先锋诗人，他立即鼓励我迅速写出来，还说可在他主办的民间体制外刊物《非非》上刊发。由于对自己的文字表达力缺乏自信，我从来写文章都尽量长话短说。这次也一样——预定只写一万字左右。没想到动笔后一口气写了十多万字，还嫌过于简略。由于篇幅过长，加之不愿让《非非》承担太大政治风险，我没有满足伦佑的用稿要求。直到2003年底，伦佑不忍这篇文稿被长期闲置而荒废，便主动将它发送给国内“文化大革命”研究学者徐友渔先生，希望得到他的指教。2004年初他又借在北京小住的机会，向徐友渔先生征求意见并寻求帮助，使这篇文稿摆脱了只供作者一人独自欣赏的命运。

徐友渔的名字我听说得很早——在三十一一年前的1975年。是两位和他那远在西昌工作的表姐夫有过密切交往的杰出女性告诉我的，她们说他是个有思想有追求的优秀青年。1989年“六四”后，因为伦佑入狱之事，这两位女性中的一位——伦佑的妻子亚琴，曾去北京找过他。他为伦佑之事出了不少力。2000年，我从他赠送给伦佑的两部著作中读到了现在的他。这两部著作是《精神生成语言》和《自由的言说》。我为一个自己二十多年前就知道名字的同代人取得的学术成就感到高兴。但是，我与他从未谋面，而且对他在“文化大革命”研究著作中关于“造反”的定义又持有异议，所以对伦佑将包含着这些异议的本书初稿发送给他，并没有抱什么期望。想不到他读了这部文稿后十分欣赏，除了赠送相关书籍供我进行修改时参考，还给美国的“文化大革命”研究学者宋永毅先生作了郑重推荐，请他提供进一步的帮助。徐友渔先生的热忱助人之心令我感动，他在学术上包容异见的胸怀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对于他也许很平常，但在文坛学界已不多见。我在他身上似乎看到了宽厚的个人品性与自由主义信念的完美结合。

我对宋永毅先生的了解，仅限于读过一本他主编的《文革大屠杀》。书是徐友渔先生赠送的。我对宋先生为此书所写前言中的基本思想完全认同。几位朋友曾来借阅此书，我都向他们特别推荐这篇前言。然而从未想到会和此书的编者和前言的作者发生什么关系。收到徐友渔先生发送的推荐信和文稿时，他正在校外开会。在匆忙的行程中读了文稿后，他不仅同意帮助联系出版，还答应给写序言。他立即给我来信，鼓励我将书稿修改成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并随信发来几份我所需的资料。与此同时，他还吩咐在家的妻子用国际快件给我寄来海外中文刊物关于造反派问题的争论文章，又托付国内的“文化大革命”研究学者何蜀先生发送给我一批所需的“文化大革命”资料。难怪伦佑得知此事后说我遇到了好心人。

何蜀先生我也不认识，只从徐友渔先生赠送的一本《当代中国研究》上读过

他的一篇文章《文革中的“揪军内一小撮”问题辨析》并见过他的名字。和我素昧平生，他却把宋先生的托付和我的需要看得很重，接连三次给我发来所需的资料。虽然远隔千里，但从电话中和发来的大作里，我依然能感觉到他为人正直、处世达观、治学严谨、做事认真的秉性。

如果没有这些朋友的热心帮助，这部书不可能最终完成和最后出版。我感谢他们。

还要感谢身边的朋友：和我相知相交二十年的黄懿女士，于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在电脑上不厌其烦地为我打出本书的初稿。王宁向我敞开自己的藏书，使我查到不少有用的资料。雷启鸿将保管多年的个人档案提供给我，使我对相关问题的认识有了第一手材料。幸代远送我一台小巧灵敏的日立电脑，使我能在键盘上修改完本书全稿。

我把历史研究的要领归结为六个字：摆事实讲道理。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问题，第一需要恢复基本事实，第二需要揭示深层内涵。在当下中国，要做到第一层已经很难，要做到第二层更是难上加难。从我有限的了解范围看国内外造反派问题的研究现状，目前似乎摆事实方面明显强于讲道理方面。无论对造反派肯定还是否定，道理都在讲——每个研究者都在阐述自己用有选择的事实给予证明的各种观念、理念、信念。但是感到，对造反派持肯定态度者所讲的道理，似乎在造反派与历史进步的关系命题面前有所牵强；对造反派持否定态度者所讲的道理，似乎在造反派与社会正义的关系命题面前有所回避。我尝试着涉入其中未被道理敞亮的历史暗区，期望某些隐约的道理有所凸现。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歪理冒充正理我谓之一忌，事实掩盖道理我谓之二忌，浅理代替深理我谓之三忌。虽然这样告诫自己，自己又未必能够做到。特别是在强调深层道理之时，自己对事实的掌握和使用，是否会有疏漏、强加甚至歪曲？矫枉过正，可能难免。只有请读者批评指正了。

在结束本文时，我想起一位少女。她是已经追随我三十七年的一段美好而残酷的记忆。她叫刘晓蕙，被誉为这座城市“文化大革命”时期最美丽的女孩，曾和我同为本地造反激进派广播站的播音员。1968年5月4日夜里，被本派守卫广播站的武装人员刘某不慎走火打死。她突如其来地倒在我的身边，默默无语地死在我的怀里。才十六岁，就彻底告别了宝贵的生命及其所感知的世界，把永远的悲痛留给善良忠厚的父母、同样美丽的妹妹、倾心相向的我。她聪明好学，虽然只是初中六七级的学生，但思想早慧，对社会和人生已有自己独立的见解。我在那段时间读到的西方小说，便是她一次又一次冒着风险寻来的。她毫无意义的死，成了我精神反思的触发点——我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全面质疑就从这时开始。1984-1985年，我在几所大学讲《爱的哲学》时提到过当时的绝望感

受：“当我意识到她永远不能再活过来，突然感到整个世界从脚下抽空了。”1985年，又在大学写作课的一篇作文中专门写到她，标题叫《早醒的少女》。我写了四句诗作为这篇作文的题词：

我的窗外有一只小鸟，
天不见亮就在树枝上啼叫；
我的心中有一位少女，
她比小鸟醒得还早。

1970年，我曾去原造反激进派自建的“烈士公墓”探望她。才两年时间，数百座坟墓已经墓碑全毁，只能凭着记忆在大概是她的坟前种了一棵仙人掌。1981年再去，整个墓园早已夷为平地，有的地方还种上了旱地作物。十年前种下的那棵仙人掌还在，只有腿部这么高，在记忆中安葬她的那个方向举着几个长满尖刺的脚印，孤寂的心有一种很深的刺痛。这以后再没有去了，只当把早逝的她和长久的怀念一起埋在心里。

我想用这部书来祭奠她的亡灵。

2006年2月22日

写于古邛都森林居

【书海泛舟】

毛泽东与青年学生和下层民众的利益契合

（《“文革”造反派真相》选读）

周伦佐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文革”造反派真相》第八章第二节。

现在论及当年人们的造反动机，大多首推十七年的“革命思想教育”所培养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盲目崇拜、狂热忠诚和绝对服从。

“革命思想教育”内容很多，主要包括：革命理论教育、历史传统教育、英雄事迹教育、忆苦思甜教育、揭发批判教育、心得体会教育……。它是毛泽东反历史社会理想结构的人文教育层面，目的是让人自小就只能听见“无产阶级”的正音，排除父母授之于耳和书刊传之于目的形形色色“封、资、修”邪音对年轻一代思想的反动影响，培养永不变质的“社会主义新人”。其实质显而易见：对

人实行“洗脑”和“塑心”，让人在接受同化的过程中，逐渐忘掉自身存在的丰富多样性，自愿成为单一模型人，自动放弃自身的主体地位和权利要求，变成领袖所操纵的政治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结果是使一代又一代青年，自我被抽空，良知被蒙蔽，人性被扭曲，从神圣的自我存在物异化为卑微的政治存在物。由此产生的效忠领袖的冲动和献身革命的热情，自然是青年造反动机中的一个因素，“黑五类”子女也不例外。

但是，这只属于人的“显意识”或“理知意识”层面的浅表动机，它不足以构成数亿人疯狂投入并持续三年之久造反运动的心理内驱力。

更深更大的内驱力有两个：一是年轻人青春期特有的非制度化倾向，二是下层民众反抗政治迫害和等级歧视的冲动。这正是“文革”中民间造反行动与毛泽东政治行为之间的两大契合点。

第一个契合点存现于毛泽东非制度化个人行为与青年人非制度化个性倾向之间。

上世纪 90 年代，一盒《红太阳》磁带唱红大江南北，关于毛泽东的纪实文学作品的销量年年位居榜首。我询问过许多爱用“向毛主席保证”代替誓言的年轻人：喜欢毛泽东什么？他们大多回答：喜欢毛“走下神坛”后的性格魅力和土土人情味。我想起从 50 年代末至整个 60 年代，很多年轻人对毛心心相印式的感觉。这期间毛发表了一系列自由言论，鼓励青年大胆造反，称赞青年首创精神，宣扬青年独立个性和勃勃朝气。其中尤以在成都会议和杭州会议上的讲话最为精彩也最激奋人心。所有讲话，皆以青年的无畏、创新和激进作为对比，对老朽守旧的官僚主义进行抨击。其中诸如“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之类名句，成为经典语录广为传播。在当年的中国，只有毛泽东一人敢于毫无禁忌地发表此类离经叛道的言论。青年们闻之无不欢欣鼓舞，直把毛当成了自己的代言者和知音。

“文革”初期，毛的这批讲话纷纷被红卫兵印成传单广为散发，在广大青年中引起的反响不亚于当年。

毛泽东的这类讲话何以能在青年中得到强烈呼应？

因为 15—25 岁年龄段的青年人，恰好处于人生的非制度化个性倾向时期。

毛泽东讲话所体现的非制度化精神，自然会在广大青年心中引起共鸣。

只不过“文革”前的青年生不逢时，与毛泽东的共鸣只能局限在心里。他们不像亿人之上的毛一样，可以非制度化地任意言说和行动而百无禁忌。他们长年生活在重重禁忌的包围之中，非制度化倾向只表现为内心的冲动，所有的外显行为都被巨大的政治恐惧吓退，并在目光中异变为失望和呆滞。

适逢“文革”的青年人则不然：毛泽东不仅向他们发出非制度化的言说，而

且公然号召他们将内心的非制度化冲动外化为实际行动——造反。十七年来年轻人青春期的特权第一次被宣布为合法，自我肯定与自我表现、怀疑与追求、叛逆与创造，尽可按照伟大领袖指明的反权威、反束缚方向放胆而行。“文革”中毛泽东与广大青年的第一次契合由此实现。

在《自由的言说》一书中，徐友渔如实记下了几位当年的红卫兵在个性问题上的切身感受。

电影导演田壮壮认为：“文革”开始时停课，很适合他这种个性特别散漫的人，所以觉得最愉快。

作家王朔说：文化革命再不好，但它打乱了生活秩序，给个性发展提供了机会。

武汉作家 H 的感受更加全面。他认为：中国的教育制度对青年学生非常压抑，使他们生理、心理、情感方面形成了张力，又没有渠道宣泄。一旦有机会表现自己，无论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无论是正确还是错误，他们都欢欣若狂。以前被老师管，现在可以管老师；以前规规矩矩，现在可以自由活动；以前足不出户，现在可以坐上火车到处跑。这都是青春期欲望的表现。这是一种个人主义、个性至上，所以他们表现出特别的欣喜、热情。“文革”还给许多人提供了舞台，让他们施展以前无法施展的才能。如出身不好的，被老师认为有思想问题或被抓到什么把柄的人，他们以前缺乏大大方方表现自己的机会，这时天下大乱，过去的家庭问题、思想问题等等此时不再成为大问题。他们这时有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这是以前绝对无法做到的。¹

这些感受，除了 H 所述内容的最后一段之外，都可以归结为广大青年的非制度化个性倾向与毛泽东非制度化个性行为的契合。

作为一个“老红卫兵”，作家张承志至今对毛泽东推崇有加，并且拒绝为自己的青春行为忏悔。他自然遭到了人们的谴责。我认为，张承志拒绝忏悔的真实原因，并非他太留恋自己发明的“红卫兵”这个名称，也不是为了掩盖“老红卫兵”的恶行，他坚持肯定的，其实只是毛泽东的非制度化个性行为与青年人的非制度化个性倾向联合上演反权威反束缚的历史戏剧。正如他所说：“为红卫兵运动中的青春叛逆性质，坚决地进行赞扬。”² 只不过，他把毛泽东和“老红卫兵”可以理解的非制度化个性行为与必须否定的行为内容，不加区别地搅混了。

不过这次契合很不普遍。毛泽东此时指引青年反对的权威，还只是其假想敌中的第一种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加上各级当权者和工作组误解毛的真实意图，仍然沿用历次整人运动的套路，将下层民众中的“黑五类”和“小右派”、“小三家村”列为斗争对象，使得有政治条件参予“造反”的青年，仅限

¹ 徐友渔：《自由的言说》，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73-176页

² 徐友渔：《精神生成语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第383页。

于以“高干”子女为首的“红五类”——官办红卫兵。出于等级本能和历史惯性，他们满以为这次运动最多只是“反右”的升级，打击对象超不出文人范畴——诸如老师、专家、名流之类压在自己头上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所以革命热情特别高涨，革命行为尤其疯狂。

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同样有响应毛泽东号召的冲动，但因运动仍然采用“反右”一类的阶级斗争模式，不少人不仅照旧处于“准法外人”之境，而且很快就和父母一起随同文人权威们一道挨整。他们尚无条件和机会实际参与。

第二次更为广泛的契合，是在毛泽东决定公开打倒刘少奇和各级当权派并批判刘所派工作组的时候。

这时，官办红卫兵见毛泽东将矛头转向自己的父辈，因利益冲突，纷纷掉头站到毛的对立面，从此退出与毛的契合点。青春期权利的合法性同时失去。

非“红五类”青年学生的机会同时到来。随着毛泽东将斗争矛头转向刘少奇及其工作组和各级当权派，“阶级斗争”模式被“路线斗争”模式取代，他们不仅直接从受压制的困境中解放出来，而且多年来深入骨髓的“准法外人”身份也间接得到平反。政治身份合法了，青春期权利合法了，反抗等级歧视并改变政治处境的强烈本能冲动也突然变为合法。这些合法权利都是伟大领袖给的。于是，他们怀着十倍的忠诚百倍的热情起来造反。造迫害自己的刘少奇工作组的反，造以刘为代称长期压迫自己的各级官僚政治权威的反。一时的解放并未完全消除自小受压形成的政治恐惧，他们在造反中随时自我提醒不能偏离伟大领袖指定的斗争大方向，生怕因此失去来之不易的合法权利。因为政治自卑心理，为了强化自己身份和行为的合法性，他们在“显意识”层面对毛的忠诚，远胜于自恃出身优越的官办红卫兵。他们当然意识不到，毛对自己的认同和自己合法性的获得，只是毛非制度化个性行为和打倒刘为首“党内走资派”的政治指向，与自己的报恩冲动、青春期冲动和反官僚冲动，暂时契合的结果。

以专整上层官僚的“路线斗争”模式取代专整下层民众的“阶级斗争”模式，同时也打破了长期加在校园之外广大下层民众身上的政治桎梏。为了获得“文革”气氛中的革命式合法性认同，更为了改善自身的处境，他们也起来造反了。由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学生最先发起矛头直指官僚阶层的造反运动，因此而队伍猛增声势宏大起来。校园外民众与毛泽东契合的因素，除了青年群体与非“红五类”学生大体相同外，其他年龄段的人群大多只限于改变个人处境和反对官僚阶层。他们的加入，既壮大了造反派的阵营，又使造反派的成份构成变得复杂起来。

看似由毛泽东一手发动，实为毛与下层民众暂时的共同行为特征和共同利益要求巧然契合而成的造反运动，一时震撼全国惊呆世界。在世人的众说纷纭中，记得那位曾在“文革”中被毛泽东邀请到北京一同检阅造反大军的法国存在主义

哲学家萨特，多少看出了其中的奥妙——他认为“文革”中毛的非组织化异举和民众的反官僚行动，是存在主义的伟大实践。萨特目光所及，显然是毛与广大青年造反者共有的非制度化行为，他自然没有看到毛与造反者性质不同的利益要求及其具体的契合点。

受中国“文革”影响，1968年欧洲和北美爆发了被称为“五月风暴”的青年学生反权威、反官僚、反资本的造反运动。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解构主义为核心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兴起，很多第三代诗人把毛泽东和“文革”当作自己的精神太阳和历史家园。于是有人认为西方造反青年和中国先锋诗人与毛泽东思想相通。这当然是巨大的误会。看起来，“文革”中毛泽东的作法，与德里达消除中心和瓦解等级的解构思想颇为相似，但对于毛泽东，这只是个性行为的特征而非思想观念的实质。真正对西方造反青年和中国先锋诗人产生影响的，只是“文革”中毛泽东的非制度化个性行为。非制度化，本是西方个体主义的外显特征和中国先锋艺术的内在倾向，他们自然很容易与“文革”中毛泽东的非制度化个性行为产生共鸣。其实，他们与“文革”中造反青年相通的地方更多一些，比如青春期反权威、反束缚的非制度化倾向，比如下层人群反等级歧视、反政治迫害、反官僚压迫的抗争本能冲动。至于说到思想观念，他们与毛泽东简直是南辕北辙：一方是张扬现代个体主义，另一方则是绞杀现代个体主义。而且毛泽东的非制度化个性行为最终所要导向的，恰好是建立以自己为绝对权威中心和等级更加森严的极权制度。这难道是他们所向往的吗？

我对“毛泽东利用造反派”的说法一直不敢苟同。

历来只能忍气吞声任人宰割的卑贱者，如今可以理直气壮地逼着整人专家公开平反并认错道歉，使挨整之事变成光荣的经历——难道仅仅是被利用？

长期被邪恶的档案制度压得出不了气的嫌疑人，如今可以将领导背着当事人制造的“黑材料”清查出来当众付之一炬——难道仅仅是被利用？

在那样一个人生被限定于狭小生活空间而且不允许任何动弹的绝对固定型社会，广大青年可以在广受欢迎和深受尊敬的氛围中免费周游全国而大开眼界大壮情怀——难道仅仅是被利用？

在那样一个绝不允许个人为实现自我价值而有所奋斗的极权主义社会，无数饱受压抑的下层青年打破等级歧视，从默默无闻的贱民一下成为世人瞩目的著名人物——难道仅仅是被利用？

在那样一个政治权力被高度垄断的官僚主义社会，民众代表通过直接选举或半直接选举进入各级“三结合”的政权当中，品尝掌权的滋味——难道仅仅是被利用？

在这个广大的世界上，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个人短暂的一生，对于一个民族

及其世代代来说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但对于自己来说却是他的全部。谁能说被大众淹没而默默无闻是人最应该过的生活？谁能说成为社会机器的螺丝钉是人最应该认领的角色？谁能说没有震撼没有激情没有回忆的经历是人生最应该的选择？至少，那罕见的人生经历及其所内化的心理体验和精神嬗变，极大地丰富了一代人的生命内涵——更不是凭一个被利用的浮浅理由概括得了的。

人类历史上的任何群众性运动，都由不同阶层和不同个人的不同利益要求，在某个时空点上恰巧交合而成。虽然总是强势阶层和个人的利益要求在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其他阶层和个人的利益要求，仍然在各种观念和口号的伪装之下顽强存现着。它们总是力图实现自身的目的，并或多或少地对主导势力起着推动、补充、修正甚至牵制的作用。于是必然出现这样的局面：每个运动都要超出主导势力的预期目标很远，然后再逐渐反弹回来。**超出**——非主导势力为满足自身利益要求向前推进的结果，**反弹**——主导势力为捍卫自身利益成果强行遏制的必然。运动高潮的结束，总是发生在各个阶层和个人按各自利益要求，朝着不同方向继续向前迈进而错过共同交合点的时候。这时，主导势力与非主导势力之间，同向变异向，同路变陌路，同盟关系无形解体，于是分歧、对立甚至激烈冲突势所难免。已达目的的主导势力必然会对未达目的的非主导势力进行阻止、遏制甚至强行干预。在群众性运动中，各个阶层和个人的利益和力量之所以能够暂时交合在一起，是因为在这个时期有着共同的敌人以及由此形成的共同利害关系。当敌对势力被打倒，主导势力为使既得利益免遭非主导势力继续推进行为的破坏性冲击，有时会向不再构成威胁的敌对势力妥协，并结成暂时的联盟，共同反对双方此时的共同敌人——非主导势力。这时，非主导势力必然会指责主导势力捍卫既得利益的行为是“复辟”，必然会痛感自己被利用或被出卖。

这在“文革”中表现特明显：毛泽东的预期目标本来只是用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解除刘少奇的权力和确立新的接班人。被他发动起来的造反民众却基于自身利益趁机把这个运动变成了历时三年对各级当权派的批判和对各级党政机构的摧毁——远远**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期目标。“文革”后七年的**反弹**，正是毛泽东为了捍卫预期政治目标而对造反运动的强力干预、极力遏制、全力打压、奋力拉回，其中自然包括了与昔日政敌——邓小平为代表的各级官僚的妥协、联盟。1974-1976年，当毛泽东感到这些新盟友竟然威胁到了自己预定目标的巩固，又想再次动员造反派与自己联手，没料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原造反民众因为利益损害和情感疏离，已经站到邓小平一边去了。

利用的确存在，但只是在各种利益要求及其行为力量的交合时期，而且是互相利用。单方面的利用，对于抱着不同目的参予运动的各个阶层和个人来说，几乎不可能。

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文革”与“两个文革”的争论，答案自会不同。

“文革”只有一个，不存在“官方文革”与“民间文革”的分野。但作为“文革”内驱力的群体利益动机构成，却至少有三个：毛泽东及其极端派的行为动机，上层红色子弟的行为动机，下层杂色人群的行为动机。站在普遍人性立场看，前二者属于过剩式贪欲，该当否定，后者属于匮乏式要求，值得同情。

无论“一个文革”论还是“两个文革”论，都未能深入到人的利益层面而只看到现象表面，由此展开争论，自然难有结果。

“两个文革”论者只要深入到人的利益层面，放弃将“四大自由”之类假象作为立论的依据，其立论便基本成立。

“一个文革”论者，只要深入到人的利益层面，不限于对“四大自由”虚假性质的识破，即会纠正自己的反驳。

利益动机的存在是人的最大心理真实。任何貌似为“公”或以“公”名进行的活动，背后都隐存着私利的动机。无论个人或阶层的行为都是如此。

只不过人的利益动机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意识到的，一类是没有意识到的。很多时候两类动机重叠交织。第二类不仅同样真实，而且往往表现为盲目的潜意识动机而驱动力更强。

造反派由自身等级地位决定的利益动机，除了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二月镇反”和“清查五一六”的迫害而要求平反翻案这部分是意识到的，多数属于没有意识到的潜意识冲动——例如反等级歧视和反官僚压迫。由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受了两千多年儒学伦理思想的导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之类的说教深入骨髓，所以中国人的利益动机——无论意识到的还是没有意识到的，都免不了要用符合伦理大义的“神圣”理由做掩饰，使得中国人的利益动机很难辨识。然而，在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和造反派“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口号的背后，他们意识到的和没有意识到的利益动机仍然存在。

人的利益动机，从潜意识变为显意识，再变为明确的诉求，有待理性的照明和提升。“文革”中的造反派还不具备这种人文条件——他们深层的利益动机盲目而隐蔽。

断然否认私利动机者不外乎三种人：弱智儿、伪君子 and 圣贤。圣贤其实也有私欲，于是只剩下两种人。

这两种人的言说自然不可信。

至于朱学勤式的“两个文革”论¹，那只是一种提法而已。因为他所说另一个“地下的‘文革’”，虽由“文革”催发，但青年们的不满、怀疑和探索，完全是反“文革”的，属于与“文革”对立的另一个范畴。朱学勤的本意不过是说明，

¹ 朱学勤：《书斋里的革命》，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年12月，第82-83页。

“文革”内部包含着官方与民间的紧张对立内涵，不可一概而论。这与把造反派完全等同于“文革”而彻底否定的认知，截然不同。

我从一些新生代文化人的文章中，看到对昔日造反者的几点隐隐约约的义愤谴责：一曰造反无理，二曰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三曰对毛泽东愚忠。

对于没能身临其境从而不可能感同身受的人来说，发出这类声音绝不奇怪。因为随着社会体制的转型、政治环境的改善和人文主体的进步，昔日造反者的行为会在后人反顾的目光中，越来越显得愚蠢，越来越不可思议。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特定的历史环境，不应该忘记在这特定的环境中同样存在的情理。我们不妨设身处地想一想：

如果自己十七年来一直遭受等级歧视和政治迫害，“文革”之初又因家庭出身或档案问题或不慎言论被打成“反革命”，受尽围攻、批斗、禁闭之辱，随时可能沦为永久的专政对象，在出现既合法又光荣的政治机会时，自己能不造反吗？能说自己造反无理吗？

如果这个有理的造反者就是当时的你，你造反的对象会是一直压制你现在又直接整你的当权者呢，还是此时将你解放出来又给你造反权利的毛泽东？既然国内当代最激进的批判型文人，大多也只敢以古人为依托或以贪官为借代来发起他们的造反，他们有权要求彼时彼地的你很早就兼具他们现有的认知和没有的勇气，去既反贪官更反皇帝吗？

如果你就是那个有理去造具体当权派反的人，长期生活在政治铁屋里，唯一的洞孔除了用来呼吸生存所需的自然空气，就是灌输以无限忠于伟大领袖为主调的革命思想之音，你能有其他思想资源作参照而对伟大领袖萌生疑义吗？而且毛泽东刚把你从政治绝境中解放出来又给你合法造反的权利，你能对他有所不忠吗？

其实，后人的谴责和我对谴责的质疑，同样可以用在“延安整风”和“反右”运动时的造反者身上。被时代局限的岂只一代人。他们都是同一个极权体制内的造反者，只能在合法的造反中寻求被认同的意义。

我想起 1971 年“批清”运动中，关在隔壁牢房里的一个死囚。他姓陈，是个贫农出身、共产党员和转业军人身份的激进造反派武斗连长，因武斗案被判死刑。从接到死刑判决书之日起直到七天后被押赴刑场，他白天黑夜一直高呼“毛主席万岁”，连续呼了七天七夜，到后来嗓子已经沙哑得发不出人声，他仍然在呼着只有自己才能听懂的“万岁”口号。

造反知青 Z，在地区激进造反派总部负责宣传。1969 年 5 月的一天到武斗前线采访，被流弹击中头部。在从死亡边缘转回——意念归附的瞬间，他连呼“毛主席万岁”，直到再度昏迷。当时在其身边的挚友 H，知道他早在 1968 年 5 月就

开始对“文革”和毛泽东产生了怀疑，早就打算退出造反，去认真钻研学问，不可理喻的口号声让 H 迷惑不解。经过十多天的抢救他奇迹般活了过来。当 H 后来问及这事，他如实相告：在意念归附的瞬间，自己最先想到的并不是什么毛泽东，而是母亲、弟弟和女友，觉得自己白白死去太有愧于他们。想到死得如此不值，总该在最后的时刻给他们留下点什么，绝望之中便只有学电影里革命英雄临死时的样子呼起口号。

按我今日的理解，这两个故事体现的都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因无可奈何的绝望，力图通过主观的合法性趋同获得客观的合法性意义。而且，这意义首先是为了告慰自己的亲人。

这使我想起中国民主政体的创立者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还有“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许德珩：身为 1949 年后“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他们临终前的最后愿望和最大安慰，竟然是希望成为共产党员！不少在“文革”初期的“红色恐怖”中自杀身亡的前辈高人，遗书中往往要留下颤抖的一笔：“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还有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斯大林时代》一书中写到的情节：不少被斯大林无辜杀害的革命者，高呼着“斯大林万岁”的口号走向刑场。

其真实的心理含义，与两位高呼口号的造反派大同小异：临死时因无可奈何的绝望，为了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给亲人留下点什么，不得不以明知虚假的合法性趋同获取现实认可的合法性意义。

被时代局限的不只是造反派。后人有权哀其不幸，但无权怒其不争。

【书海泛舟】

官方话语中左右概念的颠倒

（《“文革”造反派真相》选读

周伦佐

《昨天》编者按：著名学者朱正在《1957 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中指出：左、右作为政治概念，最初是从 1789 年法国国民议会开始的，那些政治倾向比较保守、愿意同政府合作的，被称为右派；而政治倾向激进的、要求改变现状的，就被称为左派。“如果不这样颠倒起来使用，当年的右派大都应该叫做左派，而被认为左派的其实是右派。当年的反右派斗争其实是反左派斗争。”（《1957 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541 页）。朱正提出的这个观点，在周伦佐此书得到了更详细、深入并且联系

到文革及文革后同样现象的辨析与论述。周伦佐生前多次说过：当下一些自命为“毛派”的人士，其实主要是误认为自己是“左派”，如果他们知道了在中国现实中“毛派”其实是右派，他们就会失去心理支撑而得意不起来了。

左与右的问题，国内官方话语和公共话语颠倒概念已久，有必要澄清。

叶永烈考证：

左与右这对方向名词引伸为政治名词，始于法国大革命。1789-1791年，法国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分为三派：要求国王具有绝对否决权者，集中坐在右边席位，得“右派”之称。要求废除国王否决权者，集中坐在左边席位，称为“左派”。“右派”意味着保守、守旧，“左派”意味着激进、革新。从此左、右成为政治概念，在全世界通行。¹

这是左右概念的本义。

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也是按本来意义使用左右概念的。例如：称国民党内的顽固派为右派，称进步派为左派。称民族资产阶级附合国民党部分为右翼，称支持共产党部分为左翼。依据国际共产主义的通用提法，将脱离实际而急躁冒进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实践，称为带引号的“左”。带引号的“左”即过左，“文革”中改称“极左”。毛这个时期对左右概念的使用，大体正确。

从1957年“反右”运动起，左右概念之所指便完全颠倒了，直至今日。

颠倒发生自1957年毛泽东对“资产阶级右派”概念的错误沿用。

错误的关键是完全忽视了共产党的地位从在野到执政的转变。

国民党统治时期，政治倾向上左派与右派的界限比较清楚：国共两党，共产党是在野反对派，倾向激进革新，属左派；国民党是在朝当权派，倾向保守守旧，属右派。两党以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左右划分以此为坐标：凡支持共产党者属左派，反对者属右派；凡支持国民党者为右派，反对者为左派。对所谓“资产阶级”政治倾向的划分也是这样：支持共产党主张的称“资产阶级左派”，反对共产党主张的称“资产阶级右派”。

1949年10月1日以后，共产党已经从在野党变为执政党，昔日改变现实秩序的激进倾向，已为今日维护现实秩序的统治立场所取代，以往那种以是否拥护自己来划分党外左派与右派的政治坐标不复成立。因一党专政，没有了反对党，甚至不再有其他社会政治力量，但无论党内还是党外，人们对现体制、现秩序和现政策，依然会有不同的看法并持不同的态度。这时的左派与右派划分，自然应

¹ 叶永烈《反右派始末》，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第187-188页。

以人们在现实中的政治倾向是激进革新还是保守守旧作为标准，而不能再以是否拥护共产党作为坐标。

大鸣大放中提意见的知识分子是激进革新还是保守守旧？当然属于激进革新。以此为标准，他们本是党外体制内知识分子中的左派。

一贯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毛泽东，却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常识性的错误。他不顾共产党政治地位和现实倾向已经根本改变的历史事实，看不到现实中的左派与右派划分标准已经随之改变，否认提意见属于知识分子阶层希望极权体制更加适度和社会生活更加进步的善意性激进行为，仍然像过去一样以是否拥护共产党作为划分左与右的标准，仍然将拥护共产党的人称为左派，将反对共产党的人称为右派——而且将过去反对者“资产阶级右派”的名称套用在今日异议者的身上。

要求反对官僚主义和扩大民主范围的知识分子，本属今日社会的进步左派，压制并打击知识分子进步要求的当权者，本属今日社会的保守右派。现在却一下颠倒过来：左派变成了“右派”，右派变成了“左派”，而且被贴上了子虚乌有的阶级标签，变成了势不两立的“资产阶级右派”和“无产阶级左派”。

所谓的“反右”运动，就是这样一场左右颠倒的整人惨剧。

这种颠倒，此后长期沿袭，直到“文革”以及“改革”之今日。

在官方：

“大跃进”明明形式极左，内容特右，本属形左实右，可是至今仍称为“极左”。

“文革”初期，明明刘少奇形右实右，毛泽东却称刘“形左实右”。

林彪倒台后，明明周恩来代表左，毛泽东从形式到内容都代表右，周反批毛派之“极左”，毛反批周派之“极右”。

周病重后，明明邓小平继续代表左，毛泽东仍然代表右，邓仍批毛派之“极左”，毛仍批邓派之“极右”。

毛泽东逝世后，明明邓小平代表左，“四人帮”代表右，却一直称“四人帮”为“极左”。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明明邓小平代表左，华国锋代表右，却反称华“两个凡是”论为“极左”，并用以指称囿于毛体制的僵化保守思想。

十年“改革”分明是左，“六四”镇压分明是右，然而高层保守势力却说十年“改革”是“极右”，“六四”镇压是“极左”。

在民间：

“文革”初期，明明“前造反派”属左，“前保守派”属右，但挨整的前者反被定为“右派”，整人的后者反被称为“左派”。

1976年“四五”运动，明明参与悼周拥邓批毛者为左，反对者为右，但前

者反被定为“反革命右派”，后者反被称作“革命左派”。

1976年“批邓”，明明广大抵制者属左，少数造反者演变为右，但前者反被视为“右倾”，后者反被当作“左派”。

1979年“改革开放”，明明积极拥护者属左，消极抵触者为右，后者却被视为“极左思潮”。

80年代初，人道主义的文化和艺术思潮兴起，明明力主者属左，反对者属右，前者在当时却被视为“极右思潮”，后者至今仍被看作“极左倾向”。

1989年“六四”镇压后，分明为之大唱赞歌的何新之流知识界败类属右派，对之坚决抵制的知识界人士属左派，前者反被称为“新左派”，后者反被斥为“极右势力”。

在官民之间：

1976年“四五”运动，明明民间为左，官方为右，前者反被定为“右派”，后者反被封为“左派”。

1976年粉碎“四人帮”，明明官方属左，少数造反派属右，但后者反被判为“极左”。

1982年“清除精神污染”和1987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明明民间行为属左，官方行为属右，但前者反被视为“极右思潮”。

1989年民主运动，明明民间为左，官方为右，但前者反被视为“极右派”。

左右概念明明白白之所指，让毛泽东1957年来了个大颠倒，并在官方话语甚至公众话语里沿用至今，将人们对历史事件的正常判断完全搅乱。政治和文化领域1957年以来的历史，变成了一个颠倒洞，在里面，因左右颠倒而真伪混淆，让人头晕目眩难以辨别。即使态度激进的政治家和思想者，要想夺路前行，也只能凭着实用理性的机变本能，让颠倒的概念所指服务于自己的是非判断。

例如：官方话语和公共话语至今频频使用的“极左”一词，原指1967年王力等鼓励“揪军内一小撮”的极端倾向和首都“五一六兵团”、湖南“省无联”将矛头指向周恩来的极端行为。这本是1957年以来左右概念滥用中唯一正确之处。但经周恩来、邓小平1972—1975年用来泛指“文革”倾向，其含义便完全改变——成了毛泽东形左实右路线的代名词。毛路线明明是形式极左而内容特右，但一经官方话语确定为“极左”，人们也只好接受。好在它的贬义所指是否定性对象，于是从官方到学界，人们便根据自己的需要，乐此不疲地将“极左”的瓜皮帽一次次地抛给那些妨碍自己前进脚步的极右势力。

还有官方既反极左又反极右的“两个基本点”也是这样：借用“极左”代指上层固守毛路线的守旧势力，借用“极右”代指下层追求更多民主与自由权利的革新力量。尽管前者实际是右，后者实际是左，如此借代纯属左右颠倒。但二者

都属否定性对象，概念的颠倒并不妨碍大局。

将国内思想界那些顽固的马克思主义信徒称为“左派”并与国际接轨，也属此类混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历来称为“左派”，因为他们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传统，站在体制外的反对派立场，坚持揭露和批判现代资本主义体制的种种弊端，试图推动社会的变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却相反：他们信仰并捍卫同样的主义，只不过是为了证明极权体制的合理性和极权统治的合法性，其作用无疑是阻碍体制的进步性改革和社会的根本性变革。他们明显属于中国思想界典型的“右派”。现在仅仅因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西方称为“左派”，他们也就顺理接轨——同样被称为“左派”。这不是中国思想界眼睁睁的左右颠倒吗？

所以，左右概念的颠倒得以延续至今，还和中国知识界的逻辑判断力长期弱化有关。

“整风”、“反右”、“文革”三个运动中民间倾向的相互关系及历史定位，长期无人涉及，也有这个原因。

徐友渔认为：“就总体思想倾向而言，这一代人是向右转了，因为文革暴露了他们以前憧憬的关于‘革命事业’、‘革命斗争’、‘社会主义’的种种问题。”他举了两个与此有关的例子：其一，几个曾在英国牛津大学学习的中国学者，发现自己的思想倾向与英国知识分子正相对立。英国教师多持激进的自由主义态度，对保守党的政策加以批判，中国留学生则多支持保守党而不喜欢工党，他们以过来人的眼光讪笑工党的社会主义政策。其二，有一个多次参加国际政治学会会议的中国学者，在与西方同行的交往中有一种明显错位的感觉：来自西方的学者表现出批判资本主义、理解和同情社会主义的倾向，而来自中国的学者则相反。惊奇之余这个学者发现原因也很简单：中国人是经历了“文革”并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失败的前红卫兵，西方人是经历了1968年校园造反，对资本主义弊病仍耿耿于怀的前造反者。这一代中国人对大陆的政治体制和一般方针持怀疑或批评态度。¹

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究竟是向右转还是向左转？我认为是向左转。区分左与右的标准应该是一个人在自己国家所持的现实立场和政治态度，而非他信奉的思想理念被人为贴上的倾向性标签。同样的理论体系，既可为这个国家保守守旧的统治集团服务，又可替那个国家激进革新的被统治阶层效劳。当它成为统治者维护现实秩序的思想武器，原有的尖锐性也会变为掩护保守守旧姿态的盾牌和反对激进革新步伐的长矛；当它成为被统治者改造现实状况的思想旗帜，原有的温和性也会变为反对保守守旧姿态的长矛和掩护激进革新步伐的盾牌。某种理论体系是左还是右，并没有世界各国通用的标准，关键看它在某个国家是属于主张守

¹ 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7页。

成的主流观念，还是属于主张变革的非主流思想。至少在现代社会，知识分子阶层是各种人群中最激进的一翼。其激进体现为希望以文化观念和政治制度的革新或完善来不断推动社会的进步。它总是以怀疑的态度和批判的姿势站在统治秩序的对立面，绝不成为统治权力的御用者和应声虫。这在西方国家几乎是通例。中国知识阶层主体部分这一特质的获得，自然归因于“文革”和造反运动带来的最终觉悟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和极权制度的疏离。他们转而信奉对于中国现状来说更为进步的西方自由理念和民主制度，纯属理所当然。思想观念的这一转变，不仅没有改变他们的激进革新姿态，反而使这种姿态更加凸显。怎么说是向右转呢？

中国学者到了西方国家为何会反对主张平等的“社会主义”？因为这种理念不仅在中国曾经造成深重的灾难，而且至今还在扮演着统治集团坚持一党专政和阻碍社会变革的思想守护神。疏离或者反对它，正是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国家现实应有的激进革新的左派立场。他们并没有向右转。为何西方学者会倾向主张平等反对异化的“社会主义”？因为在全面自由和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个人无能改变的实际不平等和人性异化以及后现代社会带来的主体碎裂化和精神平面化，仍然是知识阶层面对的严峻现实，马克思主义的非主流文化地位及其鲜明的社会批判精神和社会改造指向，自然使它成为激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武器。立足本国现实，双方都属于倾向激进革新的左派，基本立场并没有错位。

不妨设想一种可能的情景：西方式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多元主义的文化观念和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终于在中国全面确立并获得巩固。现有的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平等未得到有效遏制，日趋疯狂的金钱崇拜、人际欺诈、感官迷醉愈演愈烈，进一步加剧人性异化、道德沦丧、主体碎裂、精神平面的倾斜幅度。那时，激进的知识分子阶层还会继续无条件追随早已占据统治地位的自由理念和民主制度吗？这种可能性很小。知识者特有的理性本能和人性良知必将使他们同样用怀疑的目光打量这个新的统治秩序，并对其中暴露的社会弊病发出批判的声音和改造的呼吁。如果那时，马克思主义已被改造为追求社会平等和人性完整的非主流文化，它完全可能重新成为部分激进知识分子进行社会批判的思想武器。至少对于那时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这不是没有可能的事。并非这个主义有多大的魅力，而是迄今为止人类可利用的思想资源实在太少。于是产生一个问题：那些重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是否属于再次向左转？当然不是。从现在到未来，他们改换的只是坚持激进革新倾向的思想武器，而非激进革新倾向本身。他们仍然和现在这一代知识分子一样属于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左翼，并没有改变前倾的姿势。

把信奉马克思主义作为认定世界各国左派的标志，本身就包含着一个随历史演变而来的认知误会。在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前，世界各主要国家信奉

马克思主义的激进知识分子和激进工人运动都处于在野地位，他们互相呼应并结成国际统一战线反对资本主义秩序的统治，统称为左派全然成立。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的左翼运动虽已夺得政权，但它正与西方民主国家结为抗击法西斯极右势力的左翼联盟，而东方更多国家在野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也正投身抗击法西斯的战斗并伺机夺取政权，此时统称他们为左派，也还勉强说得过去。西方近代以来的民主制度并非一产生就美妙无比。至少在 20 世纪以前的数百年中，它的形象未必不丑恶。对内巧取豪夺，对外恃强凌弱，甚至用武力作后盾以国家的名义疯狂贩卖黑奴和鸦片……那时这个世界上的重大罪恶几乎都是它制造的。想一想中国十九世纪被它用大炮写下的那一册血迹斑斑的耻辱史吧，看一看西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家对它的揭露和抨击吧。当时以激进革新的姿态反对它，未必不是正义和进步。然而当“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形成，冷战时代已经开始，特别是苏联动用武力镇压了 1956 年匈牙利民主运动和 1968 年捷克斯洛伐克民主运动后，西方在野的左翼运动仍然将已经演变成专制、暴力、杀戮、反人道同义词的极权主义政权视为盟友，就大错特错了。这是一种“剧场幻象”。西欧 1968 年的学生造反运动就曾深深迷幻于其中。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和哲学家让·萨特因为一度迷幻于其中而犯下终生难以辩解的错误。但幻象终会破灭。事实上他们随后也与这些政权主动拉开了距离。只是过去的话语习惯继续保持，致使不少西方知识分子囿于其中而在划分左与右的问题上失去正常的判断。想不到这种话语习惯通过与国际接轨也影响了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看来，克服这个迷误的最佳途径，还是回到左与右这对地理方位名词引申为政治方位名词时的本义。这个本义其实是常识。

杨小凯看出左与右的划分隐含着价值判断。为了替造反派正名，他指出 1966 年 8 月至 1968 年掀起的工人造反运动、学生造反运动、市民造反运动，与 1969 年后毛泽东所推行极左的经济和文化政策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以至认为民众造反运动的“实质是极右的”，还举例说明：“大部分右派分子文革时都是造反派也显示了造反派运动在反迫害这一点上的极右实质。”¹

杨先生为了替造反派伸张正义，常以饱含激情的文字力排众议，甚至不惜失之偏颇，看得出是个主观性很强的人。没想到在区分左与右的时候也会陷入西方话语习惯的迷阵。其实，除了 1976 年不自觉站到历史进步对立面少数人，三年造反运动和造反派的实质是左而非“极右”。只要把实际上倾向造反和同情造反派的“右派”还原其左派的身份，造反派的实质是左还是右也就更加清楚了。常识性的判断被搅得这么复杂！真不知道杨先生和其他中国知识分子自称为保守守旧的“右派”时，心头是否感到别扭。至少我在为他们感到别扭之时，认为他

¹ 杨小凯《六四省悟：为文革造反派翻案》，纽约·《中国之春》，1990 年 8 月号，第 43 页。

们都是激进革新的左派。

“文革”中，官方和民间在“革新”与“守旧”的认知上都发生过巨大的错位。“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运动时，毛泽东一派自诩“革新派”并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比喻为“守旧派”，就是官方错位的话语表现。一些造反派不仅认同这种划分，而且积极追随毛氏中央并与刘、周、邓对立，是民间错位的行动证明。从所谓“革新派”推行的政治一人专制、思想一家独断、经济一律平均政策来看，他们所“革”者，实为近代以来倡行的人性、人道、人权原则以及极权制度下广大民众在这方面的最小要求。从所谓“守旧派”推行的温和政治、混合文化、缓和和经济政策来看，他们所“守”者，实为这些原则在极权制度下的少量碎屑以及广大民众在这方面的最低权利。脱去两派打有虚假倾向印记的外衣，并与近代以来从西方破闸而出的历史潮流接轨，所谓的“革新派”原来是极力阻止体制内民主改革的守旧派，所谓的“守旧派”原来是多少倾向体制内民主改革的革新派。一些造反派以激进的态度去追随真正的守旧派而反对真正的革新派，错位之明显令人啼笑皆非。好在1966-1969年他们为了反对等级歧视和政治迫害而歪打正着地冲击了极权制度的官僚系统。好在1969-1974年他们只是为了再次翻案平反而艰难忙碌。好在1976年除了少数人他们大多早就背离顽固守旧的毛氏一派而站到了更为革新的刘、周、邓一边。这一站，使他们摆脱了因毛泽东错误导向而发生的错位，激进的倾向终于获得了正确的方位。尽管在与高层两派之间的关系上发生过如此错位，但是造反派作为民间左派的身份仍然十分确定。

从左与右这对概念的本义来看，“整风”、“反右”中知识分子提意见和“文革”中民众造反的性质一目了然：他们都属于极权体制内这三个时期民间左派力图改变政治现状的激进行为。

【书海泛舟】

写作的有效性

——以《“文革”造反派真相》为例

周伦佑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录自作者《“介入”与写作的有效性——在苏州大学的演讲》（2012年），原文7300字。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作者简介：周伦佑，周伦佐胞弟，著名先锋诗人，文艺理论家，国内先锋文学观念的主要引领者之一。1992年获第二届柔刚诗歌奖；2009年获南京大学

首届中国当代文学学院奖；2012年获首届《作品》长诗奖；2015年获首届“钟山文学奖”。2004年聘任西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2013年聘任上海同济大学诗学研究中心学术顾问。

我一直持有一个观点，认为思想的力量可以改变历史。在许多人看来，历史是抽象的，因而我们个人是无法改变它，介入它，干预它的。面对这个庞然大物我们完全无能为力。我眼里的历史却是具体的，由一个一个具体的面构成的。许多历史真相可以被长久遮蔽，许多历史事实可以被任意篡改，就证明了历史的某种可修正性。

也就是说，我们个人在揭示历史的真实，还原历史的真相方面并不是完全无所作为的。我在面对历史这个庞然大物时，我不会被它的那种形而上的抽象性所蒙骗，因为我对它的那种整体的抽象性视而不见，我看到的是由一个一个具体的面构成的历史，我看到的是具体的历史。这些历史的具体面，由于摆脱了抽象性的控制而呈现为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等我们可以亲近、勘察、证伪的东西；被遮蔽的真相因而可能被我们发现，被篡改的真实因而可能被我们所揭示。我所说的“介入即是去除遮蔽”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写作者通过对历史的具体面、对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介入，还原历史的真相，揭示历史的真实，使历史呈现出本来的面貌，就是在以自己的思想改写历史、改变历史。作家个人思想的力量以及写作的有效性，由此得到确认和彰显。

举例来说，周伦佐的《“文革”造反派真相》通过去除主流文革观的遮蔽，还原文革红卫兵造反派的真相，就在“文革史”研究这个方面改写了历史，改变了历史。林贤治的《五四之死》通过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解读，纠正主流学术界刻意歪曲的五四史观，重写了一部“五四精神史”。这些都是在写作中通过对具体历史及其人物、事件的介入，去除对历史真相的遮蔽，重新还原历史，进而改写历史，改变历史的例证。

为了更好地说明“写作的有效性”，我想举周伦佐的《“文革”造反派真相》一书产生的影响为例。收入美国“21世纪中国研究丛书”的《文革造反派真相》一书，于2006年一出版，就在海内外文革研究界和国内的众多文革参与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普遍认为这是一部彻底颠覆主流“文革观”的学术力作。在一次小范围的民间文革研讨会上，我曾对这本书谈了三点看法：一、这是一部心力之作；二、这是文革造反派研究方面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三、这是一部传世之作。

有一点遗憾的是，这本书是在海外出版的，国内没有发行，很多人知道这本书，但买不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围绕这本书，发生了许多感人的故事：因为

这本书，一些文革时期各地造反派红卫兵的头面人物（包括北京五大领袖中现在活着的几个人）四处打听作者周伦佐的住址，专程坐飞机到西昌去看望周伦佐；有些需要这本书的读者，不嫌麻烦，不惜花旅程费，专程到香港去买周伦佐这本书，也有人专程去香港帮朋友带（一次只能带两三本），我就知道有一位姓彭的热心人为帮朋友买周伦佐这本书，专程去了香港三次；而国内的很多读者，更多是通过复印本了解这本书的内容，在基层的多次文革座谈会上，与会者大多是带着《“文革”造反派真相》这本书的复印本参加讨论的；在基层的一些地方，“改革开放”后挨整的一些文革中的造反派红卫兵甚至拿着这本书的复印本去找当地政府落实政策。

这样的例子很多。这样的阅读经验，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是为我们所熟悉的，20 年以后的今天，又重现在周伦佐这本书上。它在彰显和确认汉语写作的价值的同时，也有力的否决了“写作无效论”者的哀叹。

我愿意在这里重述我在那次讨论会上发言的最后一段话，作为这篇文章的结束语——

凡是对词语敏感的地方，语言就还有力量；只要语言还存在禁忌，写作就仍然是有效的。词语的力量不是表现于畅销与流行中，而是存在和彰显于禁忌与敏感之中。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作家，置身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大时代的光明与黑暗中，是最幸运的，因为我们可以通过介入写作彰显词语的力量，参与到现代性变革的伟大进程中。

我愿意用我的写作来证明这一点。

【书海泛舟】

一部校正“集体失忆”的力作 ——读周伦佐《“文革”造反派真相》

何 蜀

《昨天》编者按：本篇原发表于《文革博物馆通讯》372 期/《华夏文摘》增刊第 538 期（2006 年 11 月 20 日出版）。

对“文化大革命”诸多历史真相的“集体失忆”，是年代已久的状况了。对这一状况，有人担忧，有人愤慨，有人失望，有人熟视无睹，而像周伦佐先生这

样持续地执着于校正这种“集体失忆”，不但在日常生活中针对友人、熟人或不熟的人的回忆不厌其烦地认真加以校正，而且发愤写作完成这样一部大著的，实在少见。

周伦佐可算是那场“大革命”的过来人，为了那场“大革命”，他坐过两次监牢，武斗中险些死于非命，亲眼看到心爱的女友——全城最美丽的女孩中弹倒在自己身边……中国大陆像他这样投入过造反运动的人何止千万，然而，当年叱咤风云豪情万丈的“红色造反者”们，如今却大部分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不愿再去回忆那些对他们的一生来说至关重要的岁月，而且，愿意回忆那些岁月的少数人中，能进行冷静反思的又极少。一般来说，文化素质较高的，始终坚持了继续学习和不懈思索的，比较能够反省、反思，而其他人则大多难以跳出历史的阴影，往往止步于“蒙冤受屈”，“上当受骗”或“青春无悔”的心理层面，有的甚至在面对社会不公、个人权益受损的现实时，还会稀里糊涂地妄想“再来一次文革”。周伦佐这部书，则不但对那十年特别是其中造反运动的三年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反思，而且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可谓站在民间立场上研究文革并对造反派问题作出全方位深刻研究的第一部力作。

此书最重要的内容当然是对造反派的研究。作者运用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亲身经历所积累的感性素材，从理论上剖析了“造反红卫兵与保守红卫兵的分野”、“三年造反与十年‘文革’的区别”、造反派的构成与演变等等至关重要的问题。力图“从性质上分清造反与保守的区别”，“从时间上分清三年造反与十年‘文革’的区别”，“从动机上分清毛泽东与造反民众的区别”。作者的这些论述，澄清了一些长期以来含混不清的概念和似是而非的结论，使曾经被随意涂抹和故意掩盖的历史变得清晰起来。

在分析论述中，作者提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观点，比如，对造反派产生的原因，作者提出了一个社会“圈层”的观点，作者认为：

从最宽泛的角度考察，“文革”中各种主动性人群的激烈行为，都是社会边缘群体利用毛泽东开展党内“路线斗争”提供的机会，对中心秩序的打破和对自身权利的争取。只不过“中心—边缘”式结构的社会圈层又是多种多样的：有以大民族为中心而以小民族为边缘的族类圈层，有以男性为中心而以女性为边缘的性别圈层，有以成年人中心而以准成年人边缘的年龄圈层，有以统治阶层为中心而以下层群众为边缘的等级圈层，在统治阶层中又有以掌握权力者为中心而以丧失或者向往权力者为边缘的权力圈层，在下层群众中又有以红色出身者为中心而以黑色出身者为边缘的成份圈层……。这些社会圈层，大者存现于全国范围，小者存现于一个个具体的企业单位、事业单位、机关单位。如果说 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的学生运动、妇女运动、黑人运动，主要爆发于年龄圈层、性别圈层、族类圈层，那么中国同时期的民间造反运动便主要爆发自年龄圈层、成份圈层、等级圈层、权力圈层——并表现为青年学生造反、非“红五类”子女造反、下层民众造反、机关干部造反。“文革”中这几个圈层边缘人群的借机造反，还包含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比如学生身上就不只体现着一种边缘特性，而且学生中“红五类”子女和“黑五类”子女的边缘特性及其造反指向，也有完全不同之处。这都需要深入分析和严格区别。

这个“圈层”观点，在书中用得比较多，比起毛泽东的那套人为制造“阶级”对立的“阶级分析”方法来，显得更切合社会实际和一般人的感性经验。不过，在论述文革这样史无前例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时，以“圈层”来分析造反派的成因是否十分准确，还可商榷。至少，这里忽略了文革前十七年党化教育给广大民众心理和思维方式造成的重大影响和可能带来的后果。因此难以说明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并非受过打击迫害或并非处于某种“圈层”边缘的人们，仅仅出于“理想主义”的激情或“听党的话”的习惯而投身于造反运动。当年闻名全国的32111英雄钻井队，响当当的产业工人，又正处于令人目眩的荣誉的顶峰，并未受到任何打击迫害，只因为看到全国的文革形势，为了“紧跟毛主席”，就毅然参加造反，可算典型的一例。

此外，书中关于“红色”、“黑色”与“杂色”人群的划分，也使人感到有变相的“阶级划分”之嫌。当然，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本书中可以商榷的地方，细节上的错漏处，都时有所见。在论及文革中毛泽东与周恩来关系时，书中认为在林彪事件之后，周成为毛的抗衡力量，而且公布《五七一工程纪要》是周对毛使出的“敲山震虎”手段，“借林之手揭毛之短”。这类论述虽有新意，但尚嫌缺乏实证的依据。本书的最后两章，作者试图从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上来分析造反派，有的段落就显得偏离主题较远，似乎是另一部书的内容了。不过，从整体上看，作者的许多论述不落窠臼，独具一格，而且是很有见地，发人深省的。

周伦佐不是专门的历史研究学者，他主要从事的是哲学、心理学、文化艺术思想等方面的“体制外”研究。也许正因为如此，在他的书中才会出现许多充满思辨色彩和哲理深度的精彩论述。

比如，在论及早期红卫兵的“造反”时，书中写道：

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造反”？

分明是将特权阶层对无权阶层的隐蔽性剥夺公开化。

分明是将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文明式迫害野蛮化。

保守红卫兵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文艺黑线”和“资产阶级教育黑线”时兴起的，造反红卫兵却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时兴起的。虽然批判的对象都是“资”字号，但前者实为社会生活中残存的现代人文资源，后者实为社会等级中一贯整人压人的官僚阶层。

等级地位规定的具体行为动机，二者的差别非常分明：保守红卫兵是为了清除“阶级”异己和“血统”异己，造反红卫兵是为了改变等级地位和政治处境。

同是争取个人权利，保守红卫兵想争的纯粹是特权等级的垄断权，造反红卫兵想争的只不过是无权等级的平等权。

在论及毛泽东时，书中写道：

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国历史来说，毛泽东社会理想的实质，绝非进步而是倒退，绝非先进而是落后，绝非革命而是反动！

在论及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时，书中写道：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主要不是政见分歧而是权力失衡。自 1935 年遵义会议起开始共事，直到 1966 年“文革”爆发，刘对毛始终小心遵命，不敢越雷池半步。1959-1966 任国家主席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刘为缓解三年大饥荒造成的经济颓势所采取的务实政策，即使与毛的极端倾向有些抵牾，但初衷还是为了维护毛及其政权，根本说不上水火不容式的政见分歧。要害在于刘的务实政策偏偏与毛最为敏感的权力问题纠缠在一起，使问题变得复杂化。毛本来就是个权术大家，在他眼里，权力问题不仅是革命的根本，而且是政治的要害。小心翼翼的刘偏偏在这个问题上犯了禁忌，尽管有可能不是蓄意。

书中还随处可见作者经过深思的独到见解，比如：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解构主义为核心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兴起，很多第三代诗人把毛泽东和“文革”当作自己的精神太阳和历史家园。于是有人认为西方造反青年和中国先锋诗人与毛泽东思想相通。这当然是巨大的误会。看起来，“文革”中毛泽东的作法，与德里达消除中心和瓦解等级的解构思想颇为相似，但对于毛泽东，这只是个性行为的特征而非思想观念的实质。真正对西方

造反青年和中国先锋诗人产生影响的，只是“文革”中毛泽东的非制度化个性行为。……至于说到思想观念，他们与毛泽东简直是南辕北辙：一方是张扬现代个体主义，另一方则是绞杀现代个体主义。而且毛泽东的非制度化个性行为最终所导向的，恰好是建立以自己为绝对权威中心和等级更加森严的极权制度。这难道是他们所向往的吗？

毛泽东发动“文革”鼓励造反的本意，是为了阻止名为“修正主义上台”实为体制内民主改革的发生。在当时，最可能与这种改革产生利益契合的人群，正是对现实心怀不满并渴望改变现状随后成为造反派的黑色子女和杂色人员。可是仅仅因为暂时的利益契合，最可能支持这种民主改革的造反派人群却追随了反对这种民主改革的毛泽东。这确实是个根本的误会。

两种相反的走势表明，法国大革命和“文革”几乎是南辕北辙。前者是体制外自发的人民革命，为了给逐渐趋于疲惫的人们不断注入新的精神活力，必须不断淘汰难以胜任的领导者而让位给更为激进的领导者，直到再无更激进的领袖出现为止。后者只是体制内受控的群众运动，中央文革、造反派领导层甚至造反组织，一旦干扰了毛泽东开展运动的部署、违背其稳定大局的考虑、妨碍其恢复正常秩序的意图，就会被无情淘汰，保留下来的只能是那些能够满足控制需要的人。

中国 1976 年以后指向体制内民主改革的政治转变，实际上是由高层穿着“守旧派”外衣的人完成的，自命“革新派”的人，却被历史逼到了民主的对立面。毛体制高层内部两种政治力量最终的角色定位，并非来自他们的自觉选择，而是历史趋势和政局演变及其合力不自觉驱使的结果。

还有对“有名无实的造反派掌权”的分析，对“极权体制下的三个政治整饬运动”（延安整风、反右、文革）的比较，对“二月镇反”内幕的探讨等等，都有不少值得认真研读的内容。

此书是专门研究和论述造反派问题的，不过，作者的思考并不局限于造反派这一方面，本书的第三篇（七、八、九章），专门对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的“非制度化个性行为”、“反历史社会理想”，以及毛泽东与造反派的“利益契合”等方面，进行了认真深入的专题研究，而且有不少令人拍案叫绝的独到见解。关心毛泽东问题，关心当代中国问题的读者，都有必要读一读这些内容。

本书中不时出现的一些作者对个人经历及作者所在的四川省西昌地区文革情况的回忆，很有不同于其他大城市文革的特点，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若作者

能进一步写成专门的回忆，应该是另有独特价值的。

盼望早日读到作者的新著！